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唐旭明 魏晓蕾 朱杰
彭慧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世红 陈思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张刚强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任世红

目 录

2019年 第4期 总第120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王 芳
责任编辑:鲍跃华 王 芳 龚万达 郭晓东
王天海 蒋建忠 徐晓婷 宋 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不同社会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 魏晓东 吕存凯 0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三重逻辑 / 王润涵 王立新 19

政党制度

- 突围与形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生成进路 / 朱 虹 24
- 民主监督的现状、问题及有效性提升路径 / 熊必军 29

新社会阶层

- 创新参与社会治理路径 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
- 江苏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 张 卫 孙运宏 后梦婷 33
- 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及影响因素研究
- 一项基于江苏地区的调查 / 张伟伟 王 娜 39
- 扩大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参与 推动妇联组织改革 / 雷明贵 44

民族与宗教

- 社区变迁视角下的江苏农村基督教发展 / 朱艳伟 李 雪 48
- 完善宗教中国化的实现机制研究
- 以衢州麻蓬村天主教发展史为例 / 衢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53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网 址:<http://JSYB.chinajournal.ner.cn>

电子邮箱:jssyxb@163.com

电 话:025-84287236

传 真:025-84287236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8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华文化

- 优秀家规家训是当代政治建设的重要历史文化宝库 / 李传玺 59
- 文明对话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 / 冯永昌 65
- 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新发展刍议 / 李 锋 70

学习与思考

-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和途径研究
- 以宿迁学院为例 / 刘小杰 74
- 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与组训能力培养模式初探
- 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钱胤嘉 王梅梅 陈 超 77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4 * 2019 - 08

不同社会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魏晓东 吕存凯

摘要: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归功于 20 世纪初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先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创办报刊、翻译著作、撰写文章、举办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城乡发表演说等各种方式,向工人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启蒙工作,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工人农民知晓并接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传播。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引领下,工人阶级通过参与工人夜校、创建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方式,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践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传播。广大农民通过参加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积极接受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席卷全国的反封建农民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各阶层都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由抽象的理论到具体的思想、由深奥的学问到通俗的原理、由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到广大群众理解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无限生命力。

关键词:不同社会阶层;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作用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04-15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经有很多成果问世,研究也比较深入。从现有的成果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对工人、农民等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还不够。因此,本文立足史料对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不同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进行了初步梳理,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期望从新的角度为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提供史料补充。

一、知识分子的重要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初传中国

根据现有研究,中国人最早接触到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外交人员和海外游学的知识分子,了解国外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例

收稿日期:2019-07-01

作者简介:魏晓东,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主任、教授;吕存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研究》(zk20170330)最终报告。

如,1871年初,清政府派遣崇厚率员赴法国出访,为“天津教案”一事赔礼道歉。崇厚一行使法期间,正值巴黎公社运动爆发,随行英文译员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便将其所见所闻记载于名为《随使法国记》(又名《三述奇》)的日记中,成为中国人最早记录巴黎公社运动的文本。与此同时,当时在法国旅游的王韬与张宗良合作,撰写了关于巴黎公社运动的一组报道,并于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发表。随后,王韬又将这些译介文章加以补充,汇编成《普法战纪》一书,于1873年8月由中华印务总局出版^[1],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皆嘉许不已,可谓“当今名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无论是张德彝还是王韬,都无法正确认识巴黎公社运动的深刻原因,也不会将其与中国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仅将其作为西方国家发生的一次社会事件进行客观的记述。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传教士等人兴办的报纸刊物,了解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例如,美国传教士金楷理(Carl T. Kreyer)、林乐知(Young J. Allen)等人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等西方报刊编译的《西国近世汇编》,汇集了1873—1899年间西方各国大事,是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梁启超就曾说过:“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这份刊物最早将“共产主义者”音译为“康密尼党”、“康密尼人”,并将社会主义学说意译和概括为“欧罗巴大同之义”、“贫富适均”和“贫富均财之说”。该刊还报道了当时西班牙、俄国、美国等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状况。

在《西国近世汇编》之外,由林乐知等人创办、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又一个重要窗口。例如,1891年12月到1892年4月,《万国公报》连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翻译的《回头看纪略》(即《百年一觉》)一书,描写了一个处处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1894—1899年,刊载了英国传教士马林的《以地租

征税论》、《再论以地征租之利》、《富民策》、《各家富国策辨》、《地工本之说》等文章,系统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及单一税论。^[2]

1899年春,《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一书,最早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者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3]

1899年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大同学》一书的单行本,恩格斯的名称也开始被中国人所知:“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4]。

经过一些外交人员、海外游学的知识分子和传教士等人的介绍,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部分内容陆续传入中国,成为组成“泰西”图景的一块拼图。但整体而言,这些知识的引进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和无意识的,人们只是将其作为众多西方学说中的一种、甚至猎奇性的新闻事件加以介绍,与中国并无任何关系,因此,它们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二) 维新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人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考察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赴日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很大贡献。在这一时期,日本成为中国人了解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渠道,中国大批赴日留学生主动学习并积极翻译和引进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相关论著。根据学者的相关统计,“1903年前后,除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外,以社会主义为题或较多涉及社会主义内容的中译著作就有10余种,其

中较有代表性的中译本有:《近世政治史》(1900—1901)、《帝国主义》(1902)、《广长舌》(1902)、《社会主义》(1902、1903)、《近世社会主义》(1903)、《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述本(1903)、《社会党》(1903)、《世界之大问题》(1903)、《新社会》(1903)、《社会问题》(1903)、《社会主义神髓》(1903、1906、1907)等”^[5]。这些专门著作的译介,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更加系统和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三) 革命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与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相比,革命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介绍更为集中,因此其影响也更为深远,贡献更为积极。按照时间顺序和主要内容,可以分为辛亥革命前后两个时期。

1.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成员对社会主义的传播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1905年初,孙中山在旅欧期间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访问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E. Vandervelde)和书记胡斯曼(C. Huysmans)进行了会谈,要求接纳兴中会为第二国际成员。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就已经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民生主义”的思想主张:“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而且中国有一种十分简单的财政制度:每人按其财产付税,……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6]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进一步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为“三民主义”,并在《民报》发刊辞中做了具体阐述。他强调民生主义的必要性:“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7]

由此可见,孙中山正是在游历欧美的过程中,

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而提出民生主义的主张。他在后来的阐述中还多次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8]这些宣传,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带动下,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宣传介绍,其代表人物有马君武、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人。马君武早在1903年就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比较两者的过程中概要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指出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国人圣西门、傅里叶,中兴于法国人路易·勃朗、蒲鲁东,极盛于德国人拉萨尔、马克思,其基本主张是:“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9]文中还提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0]他在文章结尾推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并说“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11]。

朱执信曾作《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1905年11月起连载于《民报》,首篇即为对马克思(朱执信译为马尔克)的介绍。小传在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思想时,重点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朱执信援引马克思之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以此观之:“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资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然而将欲望生产力之增至无穷,则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权也。”^[12]他进而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此外,朱执信还详细解释了《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并介绍马克思

的观点：“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剥削劳动者以自肥尔。”^[13]在小传结尾，朱执信批驳了人们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反对，对这一理论表示基本认同。

此外，宋教仁曾将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一文译为汉语，发表在1906年6月26日出版的《民报》第五号。该文“主要介绍第一国际解散后，建立第二国际并召开前六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情况。……在此之前，译自西洋或东洋的各类有关文本，论及社会主义运动，对第一国际的活动情况有详略不等的记述，鲜有述及第二国际者。这篇译文，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详细介绍第二国际的活动内容。”^[14]廖仲恺将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布利斯（W. D. P. Bliss，廖仲恺译为柏律氏）的《社会主义手册》（A Hand Book of Socialism）中的两节翻译为《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民报》第7号和第12号。前文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以及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后文则区分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两方面的不同。这些文章的内容虽然并非革命党人原创，但同样促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以及由同盟会改建的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大大提升，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更为积极。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不悖，甚至说二者是等同的。这种说法虽然不准确，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达到高潮。孙中山指示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人创办《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作为鼓吹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喉舌。同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也用较多版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觉悟》创刊于1919年6月，主编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邵

力子。它是当时国内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四大副刊之一，发表过50多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作者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共产党人。《星期评论》由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创办，创刊于1919年6月8日，终刊于1920年6月6日，共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50篇左右。该刊以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国际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闻名，在当时影响很大。《建设》杂志由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创办，创刊于1919年8月，终刊于1920年10月，共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0篇左右，进一步宣传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的重要理论观点。

在这一时期，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等国民党人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瞿秋白曾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15]戴季陶本人则表示：“执信先生是尼采和马克思的合成人格。……展堂先生（引者注：即胡汉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只可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者罢。”^[16]他们在客观上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戴季陶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突出的一位国民党理论家。他不仅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商品生产的性质》以及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等著作，还在期刊杂志上发表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50余篇，比较重要的有《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经济之历史的发展》、《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等。通过翻译相关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点的理解更加深入。他主要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胡汉民作为《建设》杂志的主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较大贡献。他在这一时期曾节译《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有关唯物史观的片段，并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撰写了大量研究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文章，如《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等。从这些文章来看，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解释在当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进一步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朱执信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也最为认同。在五卅运动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发生兴趣，思想上受到较大影响。在《新文化的危机》、《野心家与劳动阶级》、《中等社会的结合》等文章中，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社会经济方面把中国社会划分为资本阶级、中等阶级和劳动阶级三个阶级，指出劳动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并认为革命者应该“扶助”劳动阶级的斗争。他的这些宣传，把改造中国社会与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而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时期是革命、进步的党派。这些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后仍然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尽管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存在误解，他们的纲领是要实行三民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宣传介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四）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无政府主义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股思潮，无政府主义对自由、平等、民主理想的追求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诸多一致性，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基本上将社会主义引为同道，因而对后者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化。

1907年6月，晚清著名学者刘师培与张继、何震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天义》，并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所”，开始宣扬无政府主义。《天义》派在宣传

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有诸多涉及。例如，刘师培曾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其中指出，欧洲社会主义始于希腊柏拉图，其后则有空想的、有以宗教、哲学为根据的。而“有以科学为根据者，则始于犹太人。一为马尔克斯，一为拉萨尔”，“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而拉萨尔刊行之书亦有《劳动与科学》一篇”。^[17]《天义》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予高度评价，曾指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18]。在1908年3月出版的《天义》上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标题为“士绅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刘师培在序文中特别指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篇；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篇亦不得不奉为圭臬。”^[19]同期还刊载了齐民社同人翻译的英国社会党领袖哈因秃曼（Hyndman）《社会主义经济论》首章，译者评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出：“自此谊发明，然后社会主义者始得新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20]

几乎与《天义》同时，旅法的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纪》，成为清末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海外中心。与《天义》派不同的是，《新世纪》派几乎没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与学说，另一方面也有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的倾向。不过，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仍然对社会主义做了不少介绍。如李石曾翻译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较重要者有《社会主义释义》、《社会党与社会主义》等，前者对泛称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不同派别做了细致的辨析，后者则批判了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斗争策略。同时，李石曾还针对当时《时报》上《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一文，撰写长文进行批驳，指出共产主义“全为大多数贫民设法”，“自然利于多数贫民”，其总的纲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社会主义与共产

主义。

《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主要活动地点都在海外,后者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回国,其活动无形中止;前者则由于刘师培于1908年叛变革命而宣告结束。在民国初年,中国国内的无政府主义分别以江亢虎和师复为代表人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江亢虎在辛亥革命后立即成立了“中国社会党”,其党纲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在该党刊物及各地支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著述的介绍,对剩余价值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涉及。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如毛泽东就曾提到他早年通过阅读江亢虎撰写和翻译的《社会主义ABC》、《马克思主义简说》等书,从中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师复及以其为核心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将自己的主张界定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客观上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上述两派不仅停留在理论宣传方面,而且以理论指导实践,积极组织工人运动。例如,1912年12月至次年3月,江亢虎曾到上海和北方一些铁路路段,组织工会。而师复在1913年成立了一个“决然俱乐部”作为工人组织的中心,其追随者在1920年代末已经负责组织了近40个工会,并在1918年组织了中国第一次庆祝劳动节的活动,还在上海出版了第一份工人刊物《劳动杂志》。中共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共同开展工人运动。蔡和森曾指出:“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州、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合作。……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这种合作“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意义实在是很大的”。^[21]可见,这些活动促成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结合,为共产主义者组织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尽管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但整体而言,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有学者指出:

“许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阶段。”^[22]在革命力量弱小的清末民初时代,无政府主义是当时最激进的革命力量,它所造成的广泛社会影响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其组织政党团体、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五)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3]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的巨大思想影响。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现实、指引国家前途的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弘扬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同时唤起了市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之后,一方面,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创办报刊,发表文章,使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更为广泛和纵深的范围传播。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高语罕、杨匏安、蔡和森、毛泽东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注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24]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

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发表于 1919 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以及阶级斗争学说。此外,他还通过讲课和演讲等形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于 1920 年 5 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将《新青年》杂志改编为这一小组的机关刊物,同时参与创办《共产党》月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重要的组织与宣传平台。大约与此同时,陈独秀的思想也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并采取各种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在《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系统宣传唯物史观,并将其积极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在《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中剖析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指明中国应该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参与、主导了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25]

1920 年,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合作发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担任《共产党》月刊的主编。他曾翻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日本学者高悬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荷兰社会民主党领袖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三部著作,并于 1921 年春在上海出版。1919—1923 年间,李达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还原》、《劳动者与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此外,还批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派别。

李汉俊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宣传和研究活动始于上海,此后主要在武汉地区。1919—1922 年间,他在各类报刊发表了 100 余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主张改造和变革中国社会,代表作有《怎么样进化?》、《唯物史观不是什么》、《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等。此外,他还从日文转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通俗读本《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并于 1920 年在上海出版,促进了人们对于剩余价值学说的系统了解。

除以上各人之外,瞿秋白、蔡和森在上海,高语罕在北京和上海,杨匏安在广州,董必武在武汉,毛泽东在湖南,邓恩铭、王尽美在济南,积极开展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创造了重要条件。

以上笔者梳理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不可能与本民族文化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她必须借助于本土民族中精英人才的介绍和推广,才可能融入本土民族文化之中,并生根、开花、结果。”^[26]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首先应该归功于几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宣传介绍和研究探索的开创性工作,马克思主义学说才能被引进到中国社会,从而实现了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传播,即“从无到有”的转变,为近代的民主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二、产业工人的特殊贡献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具有最彻底的斗争性和革命性。产业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保证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深入考察和反思这一具体过程,对于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五四运动前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情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 五四运动前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近代的工人运动开始零星出现,具有自发性。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

坚强的组织领导，这些早期工人运动大多仅针对某个具体事件，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要求，且斗争分散，规模较小。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之前，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工人运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工人组织和工人团体的类型和规模逐渐扩大。辛亥革命之前，工人主要依附于传统的组织形式，如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等。辛亥革命期间，工人阶级日益觉醒，工界方面也组建了若干新的政党组织，例如徐企文等人成立的中华民国工党，戴季陶等人发起组织的劳动党，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发起组织的自由党和工党促进会等。此外，还有江亢虎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刘师复等人发起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等。这些组织团体在调解劳资纠纷、举办工人夜校、争取福利乃至支持和领导工人运动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工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和团体，例如1914年上海海员成立的“焱盈社”，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华字部工人成立的“集成同志社”，1918年长沙印刷工人组织的“湖南印刷公会”。尽管这些组织仍带有行会、帮口的某些特点，但已经接近职工会的性质。

其次，工人运动和工人斗争发展迅速。第一，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例如，1905年开始的“抵制美货”运动中，香港、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工人纷纷参与。清末的“收回利权”运动中，广大工人积极参加各种保路、保矿和保地的组织，有的地方还公开与清政府武力对抗。在辛亥革命中，京汉铁路、汉阳兵工厂和上海等地的工人，也都积极参与到革命活动中。在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积极参加，表现出坚定的反帝爱国立场。第二，罢工次数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到1904年，全国罢工仅有50多次；但从1905年到1913年，罢工次数迅速上升到79次；从1914年到1919年5月，罢工次数更是猛增到108次。从1916年起，罢工次数呈逐年上升之势。有的工厂几年内连续罢工，甚至一年内罢工几次。第三，同盟罢工出现并增

多。例如，1909年汉口沙俄创办的几个砖茶厂工人发动同盟罢工，参加人数达到八九千人，几乎发生暴动。1916年爆发的天津法租界工人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吞并老西开的同盟罢工，不仅越过行业，而且超出了产业和地区。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为反对资本家无故辞退工人而举行罢工，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的工人立即支援，实行同情罢工，影响巨大。

总而言之，中国工人阶级的团体组织和斗争运动，是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和觉悟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同时，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工人觉悟的提高、斗争才干的增长和斗争经验的积累。不仅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化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也为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 五四运动前哈尔滨地区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由于靠近俄国，成为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由于布尔什维克和归国华工的积极活动和宣传，在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传播到了哈尔滨，并对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东铁路开工修建之后，大量布尔什维克进入东北地区，与中国工人共同工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工人群体中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现实条件。1907年，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成立“中央委员会”，统一领导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各工会组织的斗争，并对中国工人进行革命宣传。1907年1月9日，哈尔滨总工厂中俄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以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两周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此后，中东铁路沿线中俄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到1915年达到数十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中东铁路俄国工人、护路队士兵迅速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东北俄侨民和中国工人支援十月革命。此后，哈尔滨、瑗瑛、海伦漠河等地工

人先后举行罢工,与沙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

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组织秘密散发革命传单,向中国工人介绍俄国国内斗争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俄国革命的阴谋,请求中国工人给予支援。传单用通俗的语言和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重要意义。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相继创办了十余种革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俄共(布)在中国东北的机关报《回声报》。此外,大量俄国国内的革命书籍报刊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东北。

1918年12月,旅俄华工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分会。他们创办了很多中文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之后,约4万名华工通过中东铁路陆续回国,其中大部分留居哈尔滨。他们不仅带回大量革命报刊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而且将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这些宣传,有力地扩大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

总之,在五四运动之前,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在斗争规模和思想觉悟等方面,都要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人。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工人中最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影响的群体,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和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7]

(二)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情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五四运动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仅不理,且对待学生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这段话充分说明,青年革命学生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中所蕴藏的伟大力量。在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仅

创办社团、刊物,积极研究和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而且深入工厂矿区,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1920年3月,邓中夏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到卢沟桥、长辛店、通县等地工厂、农村进行演讲,就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的最初尝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纷纷创办工人夜校,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

五四运动之后,工人的罢工斗争继续发展,各种工人组织团体相继成立。仅1919—1920年一年内,上海就成立了几十个现代工会组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业志成会、中华工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上海职工公会、中华工界联合会、中华劳动公会等。此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发起成立了各种工会,如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长辛店铁路工人工会、广东土木建筑工会、湖南劳工会等。1921年8月11日,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构,同时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向劳动者宣传组织工会和提高劳动者阶级自觉的重要性。此后还在全国成立了五个分部,通过办工人夜校,出版工人刊物,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各地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积极开展罢工斗争,在1922年形成了中国工运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据统计,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923年2月“二七”罢工,全国共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罢工人数在30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铁路、工矿、航运等部门。^[28]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这次工运高潮的顶点,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规定了新的劳工政策,以促进工农运动的发展。会议之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地方党部

都设立了工人部或工人农民部,以组织、发动工农运动。这些部门中大多数秘书、干事等实权职务,都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担任。这为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创造了有力的条件。随后,经过共产党的努力,广东、上海、北方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和发展。1925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立,加强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密切了各地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5年5月,在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下,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并迅速扩展到北京、天津、青岛、武汉等20多个城市,掀起了又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浪潮。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之下,1925年6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保护下,省港大罢工爆发,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全国工农群众积极支持北伐军,再次掀起了运动的高潮。

在五四运动之后,工人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断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在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不断丰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根本转变。在先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宣传和引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工人阶级成为有着先进的思想武装的阶级力量,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走出课堂、书斋,开始真正地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

任何思想,只有真正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只有真正与现实相结合,而不是仅仅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游戏,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强大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化过程中,工人阶级作为近代中国最先进、最具有革命性的群体,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引领下,工人阶级通过参与工人

夜校、创建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工人罢工等方式,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逐渐成长为自为阶级,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践之中。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不断融合,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中的实际影响,而且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传播,发生了“从少到多”、“从虚到实”的转变,使其焕发出强大的思想活力,真正成为指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根本思想。

三、农民的主要贡献

作为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播主体之一,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此进行认真梳理,将对回答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对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由于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分散的小农经济,必然造成农民少有文化,更缺乏先进的思想。中国农民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传播者。但中国农民在旧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在反抗压迫方面,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立场是一致的,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组织下,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以独特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在中国要做任何一件事情,能不能得到农民的有力支持是成功的关键。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尤其是李大钊、毛泽东等出身农民家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了解农民的悲惨境地,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更加重视农民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注意到了农民的重要性,运用不同的方式组织农民学习,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目的是让中国农民认识、理解甚至传播马克思主

义，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能够在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坦然接受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宣传奠定了良好基础。

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向农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极参加各种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民运动讲习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农民接受并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做出贡献的重要基础。从 1924 年 7 月至 192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协助国民党在广州举办了 6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占领武汉后，1927 年 3 月至 6 月，又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广西、湖南、福建等地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此外，全国各地还办了很多农民夜校，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能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绝大多数学员毕业后，成了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地方党部农民部主办，实际上共产党人起主导作用，在培训方面非常有特色，开近代以来农民培训之先河。从讲习所的领导看，基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办，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领导，主办人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聘请。第一届主任是彭湃，第二届主任是罗绮园，第三届主任是阮啸仙，第四届主任是谭植棠，第五届主任是彭湃，第六届毛泽东担任所长。从讲习所的使命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指出，“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从讲习所的课程设置看，前五届课程主要有国民党主义、国民革命基础知识、农民运动理论和

实践、军事训练等。而第六届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有了新的进步，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主要有《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帝国主义》、《苏俄状况》、《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以及军事课程。给学员配发了《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列宁与农民》、《帝国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苏俄之农业政策》、《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等 30 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从讲习所的教员构成情况看，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六届授课的教员约 30 多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共党员占了大多数。如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阮啸仙、谭平山、李立三、林伯渠、邓中夏、郭沫若、张太雷、方志敏、陈延年等都是深受学员喜欢的教师。从讲习所的学员构成看，除一部分是自愿从事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外，绝大多数是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总体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的学员主要是受压迫比较严重的贫寒佃农子弟，他们的革命意志比较坚强，革命愿望强烈，更容易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从讲习所的教学方式看，一是大多数课程都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用形象的比喻，将深刻的道理寓于故事之中；二是有的教员讲述自己脱下学生服穿上农民服，跑到农村去宣传发动农民，领导农民和土豪劣绅斗争的亲身经历，生动精彩，学员喜欢听也容易听懂；三是除了在课堂上讲述革命理论外，学校还设有各种讨论会、新闻社、学生俱乐部等团体，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学员进步很快。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从学员选拔、课程设置、授课方式等各个方面全面体现了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征。他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启蒙教育使农民中有文化基础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最早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最终目标，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农民摆脱世代遭受压迫悲惨境地的指导思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开阔了视野，对世界局势有进一步了解，也知道了世界上反抗侵略

与压迫的苏俄革命已经成功,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对中国农民是一个很大鼓舞。此外,他们还对中国国情有了正确认识,对农民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状态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残酷的剥削,是造成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通过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系统学习,农民先进分子的思想觉悟得到大大提高。据统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了来自全国各地16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人才。这些学员毕业后回到原籍,组织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再传播贡献了力量。

(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思想觉悟大幅度提高,从讲习所毕业后他们纷纷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农民夜校,参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课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再传播的工作。他们以亲戚传亲戚,同乡传同乡,同学传同学,一传十,十传百,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农民像滚雪球一样迅猛增加,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农村的普及。起到了“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的作用。

一是积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学员在各地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还通过多种途径举办地方性的农讲所和农训班,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比如广东省农民训练所、普宁农民自卫军训练班、汕头农工运动讲习所、广东北江农军学校、雷州农民宣传讲习所、江西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北汉川县农民运动训练班、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陕西长安县农民学习班等。^[20]同时,他们还办了很多农民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夜校的培训 and 讲习所不一

样,教农民识字是一项主要任务,还教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很实用的珠算,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讲国内外大事。此外,利用农村赶集、红白喜事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还利用演讲、标语、口号、演出等方式来向农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几乎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讲习所、农民夜校,造就了大批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农民运动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农民中间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

二是广泛开展农民运动。历史资料记载,广州农讲所的学员毕业后,去向有两个,一部分学员由中央农民部分派任广东各地特派员,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农民运动的工作;更多的学员返回原籍,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地方农民运动。他们深入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揪斗土豪劣绅,推动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广东、内蒙古、河北、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协会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社会影响深远。

王首道总结自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收获时说,毛泽东同志主办农讲所的消息,像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到了湖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当时,我们一些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城里开办平民夜校,到乡间演文明戏、化装讲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那时,我们进步青年多么渴望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进行更多的革命工作啊。一九二六年三月,湖南党组织秘密通知我和其他三十五位进步青年到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讲所学习。我内心无比激动,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从长沙经武汉、上海前往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几经转折,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讲所,来到了培养干部的革命摇篮。他说,在第六届农讲所结业后,学员们立即秘密返回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举办地方性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训练班),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把农讲所的革命火种燃向祖国大地。我和一些同志怀着革命豪情沿路进行宣传工作,步行回到长沙。党组织即派我到祁阳县负责农民运动工作,担任中共祁阳县支部书记,公开以国民党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运用在农讲所学到的知识,和本县的雷晋乾、李震球等同志一起,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宣传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封建军阀、地主劣绅如何残酷剥削压迫农民,人民生活痛苦的来源和如何求得解放的道理,发动农民,组织区、乡农民协会,成立农民武装梭镖队等。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赞扬农民的举动,认为好得很。他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农民为马克思主义的再传播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勇敢参加革命军事斗争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毕业时,正值大革命紧要关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给每个学生一枚镌刻着“农民革命”四个字的铜质五角星证章,勉励学生到农村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村大革命。回到各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广大学员,深入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

农讲所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同志参加了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刘文蔚同志是暴动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之一。起义后,戴克敏同志担任了由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和第一路军党代表,汪奠川同志担任鄂东军参谋长,刘文蔚同志担任第二路军

党代表。在残酷的斗争岁月里,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同志在毛泽东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始终坚持不懈,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对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1]

来自江西横峰县农村的学生程伯谦同志,从农讲所毕业后,回到家乡,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诲,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秘密组织和发展了三十六个农民革命团,于1927年12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葛源暴动。后来,程伯谦同志历任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特委书记等职,领导赣东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建设。1934年10月,方志敏同志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后,程伯谦同志留在根据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直到为革命英勇牺牲。^[32]

在农讲所学习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李骏,毕业后回到家乡江西雩都县。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他领导了1928年的雩都暴动。1929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到赣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李骏同志积极投入了建立和巩固这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中共特市区委书记,红军师长等职。1934年,李骏同志随军长征时,写信给爱人说:“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回家。”李骏同志在长征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33]

在贺龙同志创造和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农讲所的学生也作了巨大贡献,刘革非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从农讲所毕业后,在湘鄂西边界的华容、石首、监利等县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革命武装,直至1932年6月,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27年8月1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学员黄益善、钟肇尧、周振汉、刘乃宏、舒国藩、王平章等参加了农讲所教员周恩来、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领导的南昌起义。9月农讲所毕业生袁福清参加了第六届所长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927年下半年,农讲所毕业生吴芝圃组织领导了河南省祀县、陈留县的农民武装暴动。1928年2月18日福建籍学员朱积奎领导了平和暴动,教

员唐澎和学员霍世杰领导了渭华暴动，还组建了农民自卫队。农民自卫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农民自卫队的革命实践也不断加深了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总之，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独特贡献的。他们首先是接受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帮助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团结起来，通过斗争翻身得解放，告别贫困的生活过上好日子。于是，农民中的一些先进分子，主动深入乡村，运用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使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农民心中扎根，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革命运动。

四、结论

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作用的梳理和探索，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归功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共同努力。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以不同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没有工人农民的帮助，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知晓的书本学问，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无从谈起。正因为有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才能很快为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并顺利地实现了大众化。这一历程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等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都发挥了各自独特的作用，相互支持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规律。首先，先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创办报刊、翻译著作、撰写文章、举办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城乡向工农大众等各界群众发表演说等各种方式，向工人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很多开创

性的启蒙工作，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工人农民知晓并接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传播，即“从无到有”的转变，为近代的民主革命实践提供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其次，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引领下，工人阶级通过参与工人夜校、创建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方式，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逐渐成长为自为阶级，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践之中。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中的影响，而且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传播。与此同时，农民通过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渠道，积极接受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席卷全国的反封建农民运动，及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地区的第二次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不同阶层共同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由抽象的理论到具体的思想、由深奥的学问到通俗的原理、由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有无限生命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是由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与中国人民的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4]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35]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经典作家论断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学说”，换句话说，就是让老百姓普遍过上幸福的生活。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切地盼望能够翻身解放。而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指导中国

人民摆脱压迫翻身得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中国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有了内生动力,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必然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

参考文献:

- [1][5][24] 胡为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上册)[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116-117,73,159.
- [2][16] 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55,92.
- [3][4][6][7][9][10][11][12][13][18][19][20] 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44,55-56,124-125,123-124,75,76,84,127-128,131,263,265,265.
- [8]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88.
- [14] 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册)[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499.
- [15]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0.
- [17] 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M].江苏:广陵书社,2008:769.
- [21] 刘勇.试述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积极作用[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2).
- [22]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孙宜学,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
- [2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25] 田子渝,于丽.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杰出贡献[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
- [26] 高平平.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0.
- [27] 郭渊.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5).
- [28] 王建初,孙茂生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册)[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73.
- [29][30] 王浩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3).
- [31][32][33] 武昌农讲所纪念馆,武汉大学历史系.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J].历史研究,1977(5).
-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 [3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责任编辑:宋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三重逻辑

王润涵 王立新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建立的,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须坚持的道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重逻辑思路出发探寻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三重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19-05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1]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出发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然性的历史逻辑

任何道路都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是从中国近代政治生活所经历的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前途

命运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始终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封建统治阶级洋务派推行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终因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根基而失败。作为近代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民阶级先后也掀起了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建立了农民阶级政权,但是最终也由于其小生产者代表的阶级局限性,无法最终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

收稿日期:2019-06-01

作者简介:王润涵,男,河南焦作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王立新,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比较研究。

也分别进行了以温和改良和暴力革命为手段的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求新”，谋求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但是又因为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和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导致了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但最终的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所窃取。1927 年于南京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独裁统治，严重压迫和剥削老百姓，成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又一大障碍。中国并没有走上真正的民主政治道路。

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民主道路探索的接连失败，表明因循守旧和完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都是行不通的，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寻找正确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带领人民真正走向富强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随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革命从此也就焕然一新。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民主政治理论，并进行了实践。经历长期的艰苦奋斗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根据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制度失败尝试的经验教训，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精髓，逐步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统治的道路，也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历史所向、民心所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然性

的理论逻辑

社会主义发展到现在大约有 500 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出其合理部分，并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创造性地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唯物史观，并以此为基础，使得社会主义从之前的空想阶段跨越到科学社会主义新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进行了科学分析和论证，阐释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科学预测和设想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方向和一般特征。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根据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变化又不断进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不但以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为基础，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性为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根据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之前各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人们的思想，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精神，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开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确立，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这一时期得以阐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1990 年代左右，国内外都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等方面的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建设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思路和看法，为治国理政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纪之交的阶

段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利用国内外有利的发展环境,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制度和实践等各方面的创新,依据新的实践需要,对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发展什么等重大问题做了回答,突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再一次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出现了新变化,我国发展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美好生活的热切希望不断增强,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也依然突出。面对这一系列艰难险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趋势顺势而为,对于在新时代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做了充分的回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今后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导和理论指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然性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样也是我们在实践中一步步探索,在实践中一点点总结,在实践中一次次尝试的伟大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2]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政治架构进行了大胆的预设:“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3]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政治道路的有益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例如颁布宪法,制定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等,进一步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间较短,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方面还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且制度不够完善,加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度遭受到十分严重的破坏,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中国的民主政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主化进程遭到严重挫折。事实证明,在我国绝不能完全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审时度势,总结过往社会主义民主的经验教训,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观点和新阐述,在与“老路”、“邪路”的斗争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一些“左”倾势力利用改革中的困难、问题和失误反对继续改革,主张回到改革前的状态。邓小平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4]邓小平还不断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反对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1987年4月16日,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5]西方的多党制民主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最适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民主与法制的基础比较薄弱,政治文明发展起步

较晚。我国的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而又很不平衡,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紧密结合,使之形成一个统一体,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基本政治制度。正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既没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⑥面对新时代的各种艰难险阻,面对未来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在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大步迈进的同时,也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不断完善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际内涵,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开拓新局面。

坚定的政治定力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首要要求。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至关重要。方向关系着我们道路的性质问题,如果定力不足,方向走偏,不仅无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还会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必须旗帜鲜明,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走“西化”道路的错误主张。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着不一样的效果。国外政治建设的有益成果值得借鉴,但必须始终以我国政治制度为根本。对于外面色彩纷呈的大千世界,对于他国好的东西、好的制度,我们要以兼收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利用好和吸收好外国的优秀制度成果。我们要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牢牢掌握长时间以来形成的

历史传统,并将过去走过的弯路、经历的失败教训和总结的成功经验统统都整理归结起来,根据现实情况具体分析现实问题,不可以把历史孤立起来,不能随便就将一座政治上“飞来峰”强加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上。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是一个整体,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人民当家作主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党领导人民通过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而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就是党的领导,这三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是有机统一的。如果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割裂开来,不仅将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要求严重不符,而且还会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变形走样。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有着统领作用,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核心要求,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逐步走出一条科学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显著变化,使我们更有机会和能力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要实现中华儿女千百年来伟大梦想,要克服胜利道路上的崎岖坎坷,根本上还是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我们党把握好前进道路上的正确方向、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复兴力量。

继续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又一基本要求。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同时政治制度又对社会经济基础有着重要的反作用,甚至有着决定性作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体系,可以充分保障人民享有更加真实和广泛的权利及自由,保证更多人民积极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去;可以有效调节政党关系、民族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各种国家政治关系,使之发展更加充满活力和动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稳定政治局面;可以充分解放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保证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更好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继续发展更加民主、更加科学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优势,最大限度地提供运行更加高效、可靠的制度体系,从而充分保障国家的合理有序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具体要求。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目标,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当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还不健全,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还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有着一定的差距,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运行效率不高,程序不够规范,保证人民政治权利的能力还有不足,仍需下大力气加以完善。如今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根据最新的时代要求,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这关系到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大业,是一场事关全局的深刻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部分。在不断改革创新的同时要坚定制

度自信,始终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要求,切实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和人民的创造力,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使之更加协调便捷高效,推进政府简政放权,转变管理职能、改进工作方式与作风,提高政府的工作办事能力,使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迈上新台阶,从各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历经风雨,不断探索实践的历史成果。评价我们走的道路是好是坏,不是靠其他什么标准来评价,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还是要让老百姓来评价。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民族长期和平共处、携手共进谋发展,社会一直以来保持和谐稳定。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无比正确的政治道路,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切实保障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它依托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共识形成和发展,有着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7.
-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0.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9.

责任编辑:鲍跃华

突围与形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生成进路

朱虹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硬实力持续增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区别于一党制、多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它以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屹立于世界政党制度之林,成功突破了西方政党话语垄断的藩篱,“失语”问题初步解决。然而,在“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下,进一步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彻底解决“挨骂”困境,需要双重“形塑”:对内增进民众的话语认同,坚定制度自信;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世界价值,获得更广泛的世界认同。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形塑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24-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将其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他所强调的:“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总是用西方的政党制度作为唯一的尺度和标准去衡量评价我国政党制度,在西方所谓“普适性”“优越性”的政党话语体系中,抹黑攻击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硬实力持续增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区别于一党制、多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的、独特的比较优势。它以一种新的制度

模式屹立于世界政党制度之林,成功突破了西方政党话语垄断的藩篱,“失语”问题初步解决。然而,在“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下,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彻底解决“挨骂”困境,需要双重“形塑”:对内增进民众的话语认同,坚定制度自信;在此基础上,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世界价值,获得更广泛的世界认同。

一、“突围”:“新型政党制度”论断开启话语自觉,突破西方政党话语藩篱

纵观世界各国,由于国情的不同及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选择的政党制度形式千差万别。“对于刚刚跨入 20 世纪门槛的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个‘洋物’。”^[2]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直到 1949 年 9 月才最终确立了真正适合中

收稿日期:2019-06-08

作者简介:朱虹,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由于西方政治学中的政党制度理论一直在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中占据强势地位,也就决定着在话语传播中,西方政党话语处于垄断地位,享有话语权。“话语权成了政治权力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表现方式,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8]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政党制度通常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三种类型,而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算作一党制或是一党制的一个变种。甚至在更为详细的划分法中,如按照萨托利的分类,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类似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时期的霸权党体制。以上划分都反映了西方固有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偏见,没有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价值和优势。反观国内,由于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构建相对滞后,处于“有理说不出”的失语或是“说了传不开”的自言自语状态,导致在实践中我们面对西方话语权时底气不足,在理论上被排除在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之外,在话语传播中被西方政党政治话语所遮蔽,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言、失语和缺语。“无言状态和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于‘盲点’之中。”^[9]

“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表现,包含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5]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经济硬实力持续增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而也引发了世界各方对中国道路、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和关注。2017年12月3日,由中国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空前的规模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与会各方充分认识到,植根于中国土壤、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政治制度密码’,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与新型政党制度密不可分”。^[6]“美国智库学者认为,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持了经济高速

增长,数亿人得以脱贫,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7]201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政治论断,指出其为破解世界政党难题、创新民主实现形式和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一论断的提出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制度自信,也开启了中国建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自觉,而这正是准确地看待、评价、打破西方的政党制度话语霸权的基础。

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有着根本区别:政党关系上,“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关系和谐,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8];在价值功能上,新型政党制度“克服了旧式政党制度无法克服的种种弊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9],为世界政党政治带来一种新发展模式、一种价值功能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新制度模式、一种“西方话语无法解释的新模式”^[10]。由此可以说,“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以往所有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以‘新’‘旧’界分政党制度,实现了对西方理论话语的创造性突破”。^[11]这种突破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实践成果,更是对“世界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一大创新,是政党实践的话语自觉”^[12]。“新型政党制度”论断开启了中国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话语自觉,突破了西方话语的藩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创新……对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13]。

二、“对内形塑”:增进民众的话语认同,夯实制度自信

坚定的制度自信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据统计,5年来中共中央共召开政党协商会议112场,各民主党派中央提出意见建议496件,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报送成果350多

篇；全国县处级党外领导干部达到 3.2 万多名，全国政协举办 70 多场双周协商座谈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脱贫攻坚”等国家重点中心工作的建言献策。但是，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辉煌成就相比，现实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对其不了解、不认同的现象。一方面，相当多的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现状与实践并不了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了解度相对较高，但认同度不足。根据专项调研，民主党派人士身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知都不容乐观。问卷显示：“认知程度为知道但不完全清楚”“了解很少”的占 79.06%，只有 19.23%的人“十分熟悉并赞同”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民主党派成员对目前所受到的多党合作制度宣传教育的满意度，有 60.3%的仅表示“还行”，而表示不满意的也有 14.8%。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一种政治制度必须为民众所了解和认知，才能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同支持，才有让民众形成维护捍卫这种制度的信心和决心。新型政党制度也是如此。

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被其他团体认识，是社会公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14]，而“话语权要追求其所表达的话语能被确认”^[15]。构建大众化话语体系，是增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必然之举。所谓大众化话语体系，即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向各社会阶层群众阐释新型政党制度，增进民众的制度认同、话语认同，夯实制度自信。

一是坚持话语的人民立场。作为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并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其突破了西方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在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统筹兼顾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因此，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认同“必须考虑生动的生

活实际，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16]，只有坚持话语的人民立场，广泛而真实地体现人民的利益，从人民群众的观点、立场出发，才能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话语认同，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二是坚持话语的通俗性。避免教条化、标签化的说教，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政治道理，善用形象比喻，巧用俗文俚语，活用诗文经典，在平实的语言中蕴含价值、蕴含智慧，达到化语言为力量的成效。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杰出的榜样，常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深刻的道理，用大白话、大实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话语来答疑解惑，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诗句来提纲挈领、直指人心。比如，在论述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作用时，他使用“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比喻；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时，用“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经典比喻以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通俗比方，指出要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三是坚持话语的鲜活性。大众性话语不仅要让人民群众听得懂，感到利益相关，还要在表达形式上让群众感兴趣、喜闻乐见，更多地通过鲜活生动的案例、故事、经历来展示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与价值。各民主党派作为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型政党，无论是党派中央还是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都有众多的先进典型，有丰富的积极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调查研究、反映民意的事迹。除了现身说法外，民主党派坚持革命民主斗争、与中共协商建国的光荣历史，也包含了大量的生动故事，都可以通过鲜活的个案纳入到多党合作的大众话语叙述之中。总之，立足多党合作的鲜活实践，通过讲历史、讲故事、讲道理、讲经历，以人民群众容易知晓、愿意接受的话语传达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价值和理念，了解其优势，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

三、“对外形塑”：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世界价值，提升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表征。当

今,“有关各方越来越把角逐国际话语权和合法性摆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围绕话语权展开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1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6年2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提升我国软实力,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他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系列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明确了方向。

在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需要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世界价值,使新型政党制度成为国际政党政治接受的政党制度模式,用中国智慧影响世界。既要打造不同语言、文化体系的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民主话语;还要以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话语逻辑、概念和语词系统,调整、创新新型政党制度理论话语,用时代眼光和国际视野,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世界能听懂、接受的话语表达系统,找到两者普遍认可的“共同点”和“共鸣音”。

一是“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的转换,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解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功的原因,描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前景,尽可能增加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和理解。在具体的话语表达上,要注意研究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爱好,“做好国别与区域的‘分众传播’,对不同国家受众讲好不同故事。”^[18]充分考虑国外受众的接受心理和表述习惯,努力寻找话语交流中对方国家与中国的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打造合适的对外讲述语言,拉近相互认知的距离,以柔和的语言包裹坚定的制度自信。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交往中针对外国听众讲述了许多脍炙人口、打动人心的

故事,为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树立了榜样。

二是“贡献中国智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羡慕我们国家的制度,连一些西方媒体也表示,中国的政治模式比西方更有效率、更为成功。”^[19]这说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模式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值得借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很希望向中国学习如何处理好政党关系,想了解中国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有的国家专门派特使来学习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0]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21]。因此,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时,不能仅仅对标西方国家,更要有有的放矢地针对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前因后果”、实际运行状况、特点功能优势、体现的协商民主价值等,坚定制度自信,在“贡献中国智慧”中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是正确处理中西政党话语的关系。一方面,必须坚持制度自信,坚定独立自主原则,认识到中西政党两个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本质区别,坚决反对盲目地、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西方政治理论和政党理论。另一方面,也要坚决摒弃闭关自守、狂妄自大,要坚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话语体系构建中善于综合吸收和借鉴国外政党政治中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国外政党相互监督和鞭策的关系机制,弥补新型政党制度在运行中的短板。对西方政党制度和相关理论的本质缺陷和现实不足,也要勇于批判。尤其是对于西方政党发展的“危机”、西方民主的“迷思”、民粹主义的“陷阱”等,深入研究剖析,汲取其教训,减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弯

路。同时,在中西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依托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价值,扬长避短,勇于斗争,让真理越辩越明,在比较中彰显制度自信。

四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再好的制度、再好的话语也只有广泛传播中被受众知晓、接受,才有可能获得认同,从而赢得话语权。因此,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翻译出版一批知名学者的相关精品著作,扶持建设一批外文学术网站,推动多党合作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走出去”。建立长期化、机制化、高端化的学术交流研讨会,设置相关议题,打造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与国外知名智库与高校加强交流沟通,积极回应全球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切。当前,尤其要善于利用“一带一路”等深化对外交往的良好机遇,通过官方主办的活动与组织、国际性会议、孔子学院、跨国非政府组织所举办的活动,以及具有非政府性质的海外活动与跨国机构、国际智库之间的交流等,拓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的研究交流平台。

另外,推动与西方国家的民间交往和互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增强西方普通民众对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和理解。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所属的中华文化学院可以发挥较为独特的作用。例如,浙江中华文化学院以中华文化为纽带,通过“请进来研讨”、“走出去送教”、借海外华文媒体传播和在留学生中执行“蒲公英计划”等多种途径,寓政治和统战于文化中,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于国情省情宣讲中,取得了良好成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09):10.
- [2] 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 [3] 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

2010(14):22.

- [4]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4.
- [5] 吴一敏.解读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03):112.
- [6][7]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EB/OL].(2018-10-19).http://news.gmw.cn/2018-10/19/content_31778645.htm.
- [8][9] 王小鸿.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EB/OL].(2018-03-08).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8-03/08/content_50686473.htm.
- [10] 袁廷华.中国政党制度的世界贡献[EB/OL].(2017-06-30).<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30/c40531-29373310.html>.
- [11] 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EB/OL].(2018-06-01).<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619/c40531-30064825.html>.
- [12][13][16] 刘琳.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建构[EB/OL].(2018-04-03).http://ex.cssn.cn/dzyx/dzyx_llsj/201804/t20180403_3896449.shtml.
- [14] 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 [15] 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03):110.
- [17] 中国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EB/OL].(2010-06-18).<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3434525.html>.
- [18] 切实改变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格局[EB/OL].(2016-09-20).https://www.guancha.cn/Media/2016_09_20_374863.html.
- [19] 刘维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EB/OL].(2017-09-06).<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6/c40531-29518064.html>.
- [20] [2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6-07-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责任编辑:王天海

民主监督的现状、问题及有效性提升路径

熊必军

摘要:作为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监督是人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民主监督越来越受到党中央的重视。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何改进民主监督、提升民主监督的有效性,一直是各级政协和党派的总结报告、各种协商会、甚至提案、建议中的常有话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提升民主监督有效性是政协和各民主党派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民主监督;有效性;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29-04

2013年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要切实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1]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我们探索提高民主监督有效性的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民主监督

作为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监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监督形式,旨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进行监督,是参政党对执政党的一种党际监督,也是人民行使监督权的

重要形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涉及到对民主监督的探索。“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为《意见》)明确指出:“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4]文件首次对“民主监督”作了明确的概

收稿日期:2019-06-11

作者简介:中共厦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厦门市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括:民主监督的定位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是“政治监督”和“相互监督”,不同于一般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的形式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不同于全国人大与各级人大的法律监督、各级政府的行政监督以及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等其他形式的监督。民主监督的内容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的监督”,包括对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参加人民政协的单位和个人执行人民政协决议等等。民主监督的主体是“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中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进行”。正是民主监督定位、性质、形式等与其他监督形式不一样,所以有学者认为,民主监督具有一些鲜明特点:民主监督具有政治性、合作性、非强制性、外部性、组织性等特点。

二、民主监督的现状和问题

民主监督作为一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积极行使监督职能的监督形式,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于如何改进民主监督,以及如何提高民主监督的有效性,一直以来是各级政协和党派的常有话题和努力解决的难题。其原因关键在于民主监督双方监督与接受监督意识不强,民主监督形式内容定位比较模糊,民主监督制度安排与操作比较滞后等等。

(一)民主监督的双方主动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都不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海与党外人士的讲话中提到,在民主监督中,接受民主监督的中国共产党应主动接受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真诚欢迎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主要监督者——党外人士,我们应该敢于监督。但事实上,民主监督双方的主动监督与主动接受监督意识都不强,关键在于对民主监督的认识不够。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民主监督的主要接受者,由于缺乏对民主

监督的充分、正确认识,以至于一些基层干部不能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忽视和抵制民主监督,认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无非就是开会发个言,说说意见建议就可以了,民主党派的成员只要做好自身工作就行了,严重挫伤了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的积极性。作为民主监督的监督方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由于在民主监督中没能正确地认识到民主监督的重要性而导致监督意识不强,在民主监督过程中缺乏主动性、积极性,更多地表现出形式主义,出现了许多不敢讲、不想讲、不能讲、不会讲等问题,使得对地方党委与政府工作的意见与建议不能充分表达,导致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二)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定位比较模糊

民主监督的形式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民主监督的内容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包括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宪法、法律、法规的实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实施等等。但实质上,如果我们把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的内容形式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没有明显的边界区分。当前出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党外人士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搞得很火热,而民主监督却没有实质性的行为动作展示,关键在于没有真正理解民主监督的内容与精神实质,以至于定位比较模糊。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认为民主监督应当是更高层次的监督,是对党和政府重大决策的监督。还有人认为,民主监督的重点应该是对党的监督,所以民主监督的关键是共产党。有的认为不能把民主监督等同于反腐倡廉,如把民主监督定位为科学执政,成果就很丰富。^[5]在没有明确民主监督跟参政议政之间实质性区别的情况下,往往就很容易忽略民主监督的形式表现和内容表达,以至于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得不到应有保障。

(三)民主监督制度安排与操作比较滞后

民主监督有赖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外人士之间合理、规范、有效的互动,也依赖于民主党派和执政党之间民主监督各项有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这些机制包括知情机制、沟通机制、反馈机制等等。只有畅通民主监督的各个环节,才能实现其应有的效果。《意见》明确指出:“要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知情、沟通、反馈等方面的制度,畅通民主监督渠道。党委、政府监察机关和新闻媒体要密切联系人民政协,加强工作协调与沟通配合,提高民主监督的质量和实效。”但在实际工作中,民主监督缺乏完善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具体操作程序建设也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主监督的质量或效果与知情的广度、深度是成正比的。目前民主党派监督的知情渠道不畅通,方式单一,导致民主党派在很多领域信息获取不充分,情况掌握不全面,以至于难以全面监督或有效监督。此外,民主监督是主体客体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有监督必有反馈。没有反馈或反馈不充分,民主监督的实效性或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市县级的党派组织中缺乏专门承担民主监督职能的机构,加上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兼职身份,很多人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工作任务繁重,也难以挤出时间研究、从事民主监督工作。再加上机关工作人员较少、经费不足,导致民主党派在民主监督工作方面,即使想做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提升民主监督有效性的路径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时强调要认真研究有效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路径和措施。2015年3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加强和改进政协民主监督……开展具有监督性的履职活动,如实反映情况,坦率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促进相关工作的改进和加强。强化民主监督组织协调、知情反馈、沟通联系等环节制度建设,提高监督实效。”^⑨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及俞正声主席的建议,都为新时代如何提高民主监督有效性指明了方向。

(一)明确民主监督及其有效性

《意见》提出民主监督的方式有意见、批评和建议等,但无论是通过会议协商、沟通对话,还是通过提案、调研报告等形式,其实质都是话语权的表达。因此,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话语权的影响力。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都是通过提案、调研报告或者其他形式,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来实现的,这三个功能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和有机统一的。特别是有时候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两者结合在一起,民主监督也要借力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来彰显民主监督话语权的影响力。但是如何有效区别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凸显民主监督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混为一谈,会更加淡化民主监督,以至于一些干部接受民主监督的意识更加淡薄,参政党成员主动监督的角色意识更加淡化。其次就是要明确什么是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来提高民主监督的有效性。民主监督应该立足“民主”、着力“监督”,在“言”字上做文章,用“言”的影响力来表达民主监督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所提意见、批评和建议要有影响力,“言”有针对性、深刻性、可行性,提出问题“说”得真,分析问题“评”得准,解决问题“议”得实。“言”而有理有据有物有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民主监督的有效性。

(二)强化民主监督的角色意识

《意见》明确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听取政协的批评和建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按照这一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都应充分认识民主监督对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作为民主监督的接受方,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强民主监督的讲话、文件精神,增强接受民主监督的意识,准确掌握民主监督的内涵、要义及作用,强化接受民主监督的角色意识。作为民主监督者,各民主党派不仅要敢于监督,而且要善于监督,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强化真正监督和敢于

监督的意识。因此,民主党派要不断加强思想建设,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牢固树立参政党意识,不断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责任意识,主动建言献策,敢于监督。要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世情、国情、民情,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努力提升自身的民主监督能力。同时,双方应加强相互监督和相互接受监督的角色意识。

(三)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安排

在完善民主监督的各项制度中,首先我们要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强化民主监督组织协调、知情反馈、沟通联系等环节制度建设”要求,逐步将民主监督的主体、内容、形式、对象、途径和程序确定下来,完善知情机制,扩大知情范围,落实反馈机制,强化制度保障,把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的民主监督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增强民主监督的透明度,减少民主监督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民主监督能够按照既定程序进行。其次,要构建民主监督的制度平台。可以考虑整合现有党派监督资源,搭建党际监督平台,定期对地方政府的各类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评议,使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四)构建民主监督责任机制

要强化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必须加快构建民主监督的责任机制。要明确规定执政党接受民主监督和作出监督反馈的责任,参政党民主监督的职责和权利,强化监督方和接受监督方的双方责

任感,提升民主监督的有效性。一是加强党的监督评价机制建设。建立由统战部门牵头,各民主党派参与的考评机制,既要对接执政党的各级政府官员是否接受民主监督进行考评,也要对各民主党派是否敢于说真话,真监督进行考评,确保正常的民主监督不受干扰和影响,使民主监督能够顺利进行,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二是要尽快构建民主监督的问责机制。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尽管许多政府部门和各民主党派都建立了对口联络制度,但因为相关单位不积极,以致于民主党派缺乏监督的勇气和动力。而构建民主监督问责机制,则有利于促进监督双方自我认同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民主监督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孙津.民主监督的制度安置及困难刍议[J].协商论坛,2014(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八三—一九四九):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09-610.
-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35.
- [4] 虞崇胜.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特点和优势[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2(4).
- [5] 王建华,王云骏.我国多党合作的民主监督问题研究——基于比较政党制度的视角[J].学术界,2013(1).
- [6] 解永强,任稟洁,唐倩.全面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建设研究[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

责任编辑:蒋建忠

创新参与社会治理路径 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

——江苏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张 卫 孙运宏 后梦婷

摘 要: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力量、新阵地、新资源。随着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日益增多、队伍逐渐壮大,将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其智力密集和人才荟萃的优势,应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重要的着力点。通过对江苏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发展现状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在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制度困境和问题。统战部门要以“社会化、平台化、项目化”的工作理念,打破原有从上而下开展工作的传统体制,形成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网络,以多元参与、协同推进、结构优化、覆盖广泛、作用明显的统战工作机制,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统战工作向新业态、新组织的拓展。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统战工作;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4-00033-06

一、社会治理与统一战线的逻辑统一

社会治理是根据国际环境的发展和政府改革的效果,通过对社会管理过程中权力格局的分析与判断,对社会管理过程和模式进行的创新。社会治理与统一战线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参与治理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起有序关系。它是多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协商、沟通、对话等方式,依据法律法规对相关社会事务、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广义上的统一战线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的目标能够加以实现,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相应政治联盟,它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就实质而言,同样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共处,因此统一战线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从服务对象来看,统战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都是党领导下的重要工作,都体现了党的群众工作理念。实质上都是通过做人的工作,建立各社会阶层的广泛联盟,其中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更是直接以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为工作对象。其次,从发展目标来看,实现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国家的

收稿日期:2019-06-05

作者简介:张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孙运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后梦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治理和统战工作的共同战略目标。通过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治理和统一战线最终都是为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另外,从实现路径来看,社会治理需要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也需要时刻将统战对象的不同诉求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统一战线与社会治理都需要通过协调各主体之间的不同诉求,促进组织合作来实现。

总体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组织化的社会生活逐渐向个体化的社会生活转化,统一战线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将不断影响社会治理的进程与效果。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新要求

社会组织为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和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渠道,是党和政府宣传方针政策的重要桥梁。只有充分认识并发挥社会组织具有的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思想的作用,调动广大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才能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合力。同时在新常态下,社会组织日益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有生力量,掌握着大量的人才、资金、信息、技术和人力等资源,是党和政府需要团结和争取的重要资源。统一战线应积极整合各类社会组织资源,把广大成员的人心凝聚起来,力量汇聚起来,引导其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

(二)社会组织是全面履行统战工作职能的新领域

以社会组织为纽带开展统战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统一战线工作的空白点,使统战工作的格局由过去主要依靠单位体系向更多地依靠社会组织转变。另外,当前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渠道不通畅,且政治参与活动的偶然性、不确

定性和短期性较为明显,某种程度而言形式大于实效。鉴于此,只有加强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政治引领,切实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才能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在协调社会关系、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整合民众利益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具有的重要作用。

(三)社会组织是统战工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途径

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密切相关,统战工作通过凝聚人心、增进团结、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发挥最大化的治理效能,协调各方利益主体,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随着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成为新时期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通过资源整合,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服务社会治理创新。

二、江苏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工作,统筹确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各级统战部门充分运用统一战线优势,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找准统一战线的“最大公约数”,齐心绘就“强富美高”新江苏最大同心圆。

(一)江苏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

截至 2017 年底,江苏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达 87555 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 10.8 个,总量居全国第一位。其中社会团体 35139 个,社会服务机构 51225 个,基金会 660 个。全省社会组织登记总量约占全国的 12%,从业人员约 90 万人。

1.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基层公共服务。江苏以社会服务项目为抓手,着力推进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的基层公共服务。南京、苏州、扬州、镇江等地均安排专项资金,通过开展公益创投、购买服务、项目奖励、机构补贴、培训、评估等多种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项目、支持孵化培育基地运行、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能力建设,各市投入资金

共计 8376.4 万元。

2.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组织通过搭建沟通平台和载体,起到对话沟通作用,有助于实现社区公共生活的有序化,建立起基层各主体有机整合、良性互动的社会秩序,减少了社会矛盾冲突,维护了社会稳定。江苏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紧密贴近群众、直接服务群众的特点和优势,引导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

3.丰富社区文化,推动基层社会和谐文明。社区丰富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近年来,江苏各地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文化建设,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提高了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改善了社区人际关系,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进而形成了整个社会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

4.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基层慈善公益活动。截至 2018 年 5 月,江苏基层慈善组织总数已达 13450 家。其中,全省村居慈善工作站为 12250 个,覆盖 65%的城乡社区;乡镇级慈善分会为 1200 家,慈善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断发挥专业优势,卓有成效地开展志愿服务。

(二)江苏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基本特征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力量、新阵地、新资源。江苏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体呈现年轻化、专业化、高学历的特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35 岁及以下年龄段占比较高,且逐渐走上了专业化、职业化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拥有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专业学历,具备《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融入自身的职业,专职从事社会服务。

2.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服务性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服务范围广泛,涉及各领域、各地区、各行业,涉足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社区发展、个案救助等问题,既有省级公益创投项目,也有设区市、区县以及街道、公益孵化平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充分发挥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和精准精细的专业服务,为更多弱势群体开展服务,增进社会福祉,他们中的一部分精英人才可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3.思想意识主流积极、责任感较强。大部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抱着对工作的热爱和对服务群体的同情共感开展工作,是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较高的群体,他们希望在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认同,提升社会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尤其是一些社会组织的创办人参政议政愿望强烈,具备专业的知识,议政建言能力也较强,渴望拥有表达利益诉求的载体和渠道。因此,如何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正能量”汇入社会治理,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课题。

4.内部构成复杂、差异性鲜明。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很不平衡,不同行业或地域的社会组织之间、甚至同一个社会组织之中,其从业人员的人才结构、收入待遇、地位影响、利益诉求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一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相对较高,收入也较高,三四线城市和偏远县城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也较低。因此,统战部门应进一步积极引导和凝聚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在日常生活、心理健康和工作开展等方面给予关心。

(三)江苏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江苏各级统战部门在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强化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网络化组织结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通过平台建设、组织建设、载体建设等一系列方式将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优势。

1.南京全力打造社会治理品牌。南京市社会组织工作紧扣激发活力,紧盯治理需求,上下联动、多元协同、以用为先、大胆创新,在社会组织登记数量、服务领域、经济贡献等方面显著提升。市委统战部组建以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为主体的南京市社会组织党外人士联合会。以“有平台、有项目、有资金”的目标重点培育扶持统战工作类社会

组织,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重点聚焦社区类专业服务。推荐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的代表人士参政议政,加强社会组织协商和智库建设,畅通党外人士参政议政资政渠道。

2.镇江构建“社会组织+互联网”工作新模式。镇江市以网络社会组织为抓手,坚持培育引导和管理规范并重,加强网络社会组织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一方面使社会组织常年致力于参政问政、网上发声音、亮观点,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另一方面又注意组织网民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引导网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镇江依托网络社会组织,每年策划开展爱心捐助、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网络主题文化活动 400 余场,吸引 50 多万网民参加。网络社会组织成为民间力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政府行使行政职能的有效补充。

3.南通探索“12345”统战工作新方法。作为江苏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统战工作试点地区,南通积极探索“12345”工作法,最大限度地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1”是成立“一个组织”。在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下设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2”是建立“二项工作制度”。建立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市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科协、社科联等部门和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市委统战部主要负责同志及领导班子与社会组织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3”是打造“三个服务团队”。由社会组织代表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组成“爱心服务团、律师服务团、文化教育服务团”,发挥群体优势,开展社会服务活动。“4”是创建“四大工作品牌”。组织建言献策活动、组织社会服务、开展专题教育、开展特约监督。“5”是培育“五大实践基地”,为各群体提供良好的实践服务平台,宣传推介先进典型,进一步扩大群体的影响力。

三、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虽然江苏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不断提升,但与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相比,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社会组织协

同参与社会治理仍面临一些制度困境和问题。

(一)协同运行机制有待健全

统战工作不是单一统战部门的工作,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更需要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依靠各个相关部门来协调运行。就调研情况来看,统战工作的协同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尽管不少地方建立了以党委领导、统战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大统战”格局,但是实际的运行仍然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关键是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不够明确、互通联动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整体效果。

(二)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创新

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在社会组织中可以发挥“顶梁柱”的作用,是决定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变量。当前大部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大多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统战工作对象的发展变化带来代表人士队伍结构略显失衡。同时,现行的统战工作机制无法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身份的多样性相适应。能够提供给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政治资源相对稀缺,对各类社会公益活动的引导也相对不够,能够供统战部门支配的资源也相对较少,活动形式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创新。

(三)引导参与渠道有待畅通

由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大多在市场环境中生活,组织性较弱,不像传统体制内的工作群体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他们大多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而目前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主要是民政部门单一进行,多部门联合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统战部门如何建立有效的引导评估机制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补齐在评估主体的选择、精细化的评估体系构建、信息公开以及实时监督等方面都存在短板,成为统战部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四)统战政策宣传有待加强

调查显示,一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对统战工作的信息接触和了解不多,认知度较低,这说明统战工作的力度还比较弱,覆盖面较窄,仍然面临“楼进不去、门打不开、人找不到、话对不上”的情

况。同时,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有许多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开阔的视野、乐于接受新兴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他们的需求。在现有的条件下,统战干部队伍面临着有效工作载体不足,缺乏工作抓手和落脚点等问题,不能以一种立体化、即时性、交互性、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工作。

四、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对策建议

未来社会组织规模将更加壮大,整体向专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专业化、职业化,未来,如何建立一个功能平衡、结构完整、组织严密、专业运行的组织体制,如何整合优势人才资源,强化教育引导是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在社会组织从量变实现质变的关键转型期,统战部门要以“社会化、平台化、项目化”的工作理念,打破原有从上而下开展工作的传统体制,形成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网络,以多元参与、协同推进、结构优化、覆盖广泛、作用明显的统战工作机制,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统战工作向新业态、新组织的拓展。

(一)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现党建与统战“双覆盖”

要积极推进社会组织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大统战”思维,理顺登记注册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统战部门在党建工作中的关系,探索务实管用、灵活便捷的党组织设置形式和工作方式。对已经成立党组织的,统战部门要积极引导,发挥其组织依托和领导核心的作用,对一些暂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统战部门要挑选合适人选,聘任为党建联络员和统战联络员,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党建工作和统战工作要在工作力量、平台载体、工作机制上实现融合,营造“组织、阵地、队伍、方法”四位一体、融合共建的良好态势。

(二)以社会化思维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

做好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首先要在党的领导下,把社会化思维作为引领新时代社会组织工作的核心理念。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职

责,健全机制,形成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因此,各级党委应当自觉将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范畴,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开展的好坏作为党建考核的重要指标。明确赋予各级党组织团结引导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工作职责。在“统战+”开放合作机制驱动下,统战部门和基层党组织、群团组织、统战社团、民主党派、社会组织、成员之间跨界合作,构成开放型、网络化的“统社合作共同体”,形成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真正意义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三)激活枢纽型统战组织自我增益的机能

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要在充分尊重各个组织发展特色和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掌握一部分规模较大、运行良好、影响力强的社会组织,在充分体现行业、界别、学术以及专业等特色外,发挥从业人员联系、沟通、帮助、引导和维权作用。做到以点带面,利用枢纽型社会组织将一些零散的小组织联系起来。统战部门应以已有并发挥作用的统战团体为工作依托,延伸和拓展统战团体的联系交友覆盖面,充分发挥各类统战团体对相同领域、相同性质、相同类别组织的工作辐射、指导和归属作用,通过团结帮助、交友沟通、广泛联系、服务引导等方法,构建新的统战工作渠道。适当建立新的统战团体,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充分展现统战社会组织强大的自我整合、自我增益、自我运作、自我规范的机能。

(四)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通过定期教育培训,加快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指导社会组织健全权责明晰、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在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上,对个体实行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探索社会组织代表人士的制度安排路径,将优秀的代表人士吸纳到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队伍中。要打造有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加的政策咨询会,支持他们共同商讨社会公共事务,听取他们对于业务相关的重大事项

或重要决策的建议,架构起社会与党政部门进行协商对话的桥梁,在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和关系协调的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和政治认同。

(五)打造孵化平台,实现社会组织的再组织

以优秀社会组织为抓手,打造全新统战孵化平台,实现不同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人才结构的再组织化。一方面,建立实体化的功能平台,体现了“寓统战于服务之中”的理念,实现服务成员发展和服从统战工作目标的统一。有效扩大统战工作的覆盖面,解决统战工作向基层延伸“最后一公尺”的落地问题,实现统战工作“链接”方式由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平面网络向立体网络迭代升级。另一方面,与民政部门一起联合打造统战组织孵化基地,在实现社会组织数量规模发展的同时,加强政治引导,建立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联盟,用统战思维和社会治理思维重建社会组织联系网络,把社会组织的能量引渡到更广泛的领域。

(六)搭建“互联网+”平台,实现社会治理的智能化

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降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际运行成本,通过云空间增加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利用率。通过在基层政府搭建智慧平台,吸引公众参与,形成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体化网络,为政府、公众、社会组织提供一个开放化、社会化、互动性的信息平台。同时以互联网为依托,建立社会组织多方监管、信息公开、过程评估的网络机制,降低线下操作中人力、物力在承接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过度损耗。对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而言,建立网络互动平台,能够帮助他们相互交流心得,扩大精英人士的社会辐射效应,建立诉求双向反馈机制,促使人人有机会有条件有路径表达利益诉求。

(七)以项目化理念树立社会组织品牌

按照“抓点示范、以点带面”工作方法,积极培育重点项目,坚持典型引路,分级分类强力推进示范点建设。寻找运行规范、效果良好、复制性佳的优质项目,加大孵化扶持力度,使其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示范典型”,尤其是在不同的基

层社区形成特色鲜明的社会治理服务项目,做好宣传推广。一方面,通过加强公共服务项目的需求评估,增强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性,将突出反映现实需求的地区性项目挑选出来,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增加项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通过搭建自由平等的项目承接平台,增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和独立性,在项目申请和运行过程中不断促进项目设计和操作的规范化,通过审核、监督、评估等各个环节打磨优势项目。通过赋予组织、平台以动感和质感,增强统战工作的亲和度、契合度和实效性。

(八)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扎实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

各级统战部门,包括乡镇、社区基层都必须明确设立相关工作人员,保证部门、领导、人员的合理安排,做到有人管事、有人做事、有组织办事。对于规模较大、影响力强的社会组织应物色专职人员担任统战员,配合统战部门开展工作,做好本组织以及相关组织的统战工作。对于社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所需经费、场所、人员,应予以保证,并纳入到资源分配的工作考量之中。在日常工作中要重视对统战干部的培训,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对长期坚持在第一线的统战干部要真诚关心、支持、爱护,珍惜人才,对他们的工作热忱给予肯定和勉励,保证统战工作在社会组织中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 [1] 吴庆华.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精细化治理效能分析[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6(3).
- [2] 胡小君.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J].江汉论坛,2016(4).
- [3] 苏曦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政府角色调整——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J].政治学研究,2016(4).
- [4] 陈思,凌新.社会治理精细化背景下社会组织效能提升研究[J].理论月刊,2017(1).
- [5] 张卫.关于推进新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调查研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2).

责任编辑:郭晓东

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项基于江苏地区的调查

张伟伟 王 娜

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江苏地区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实证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出现群体分化趋势。具有年纪轻、学历高、收入处于两极(较高和较低)等特征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往往具有较高的网络参政行为。新社会阶层的主观政治理念比客观政治现状更容易激发他们的网络参政行为。此外,媒介通过为新社会阶层提供信息、观点和渠道,成为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政治认同;媒介依赖

中图分类号:D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4-00039-05

一、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由此衍生出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形式,并产生了新的工作群体,他们主要是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或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律师、税务师、会计师、评估师等)、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和新媒体人士。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第一次将这部分群体称为“新社会阶层”,并肯定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地位。^[1]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对象纳入统战工作范围。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政治意义。郑曙村、郭永奎指出,“随着财富的积累、经济实力的增强,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2]齐杏发认为新社会阶层“推动了社会阶层关系的重构”、“消解了传统政治的根基”,“是当代民主政治大厦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推动者,是建设和谐的政治社会关系的生力军。”^[3]但可惜的是,尽管新社会阶层这一群体的参政议政诉求强烈,但他们的参政渠道

收稿日期:2019-06-11

作者简介:张伟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娜,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新社会阶层的媒介素养与政治认同研究》(19YJC860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十分有限。例如王邦佐和谢岳在《新社会阶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一文中提出,新社会阶层“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但是影响政治的社会化组织、制度化途径还不健全”、“新社会阶层由于其政治地位还不十分明朗,所以现行制度为其提供的参与途径不多,政治空间较小。”^[4]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参政”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参与方式,在新社会阶层中受到欢迎,逐渐成为他们实现民主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学者们指出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存在“不平衡性”、“非理性”、“无序化”等问题,但他们还是肯定了其积极意义。杨艳东、陈明丽在《论新媒体时代新社会阶层的有序政治参与》一文中指出:“新媒体技术为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和更加宽松的环境,各种介质的网络参政已成为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5]罗琼也在《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将构建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体系视作完善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那么,目前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情况如何?他们的网络参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有效引导新社会阶层进行有序、理性的网络参政?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我国新社会阶层最主要的集聚地之一——江苏地区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实证调查,探究当前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情况及其问题。

二、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意涵与研究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它主要指公民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活动。从参与形式来看,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参与包含两种基本类型:传统政治参与(传统参政)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参政)。在形式上,著名政治学家王绍光指出,网络参政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包括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网络信访等形式。^[6]在特征上,熊光清对网络参政和传统参政的比较研究后指出,网络参政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强、直接性高以及多中心的优势。^[7]在影响上,张明新指出,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网络政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政治的反映和延伸,因而网络政治

参与方式的变化对现实存在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深远影响。^[8]郭小安则忧虑网络参政可能带来网络民粹、参与盲从、参与极端等问题。^[9]

在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讨论新社会阶层传统参政的意义、特征与影响因素。关于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意义,管前程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促进政治稳定,加快民主化进程。关于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特点,学者首先认为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功利性”。文道贵、陈志宇指出,“新社会阶层政治意识萌发及政治参与的最原始动机是经济利益的考量,即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提高社会地位,保护经济利益,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10]此外,韩影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层次性强”、“组织化程度低”等特点。^[11]对于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学者分别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内在因素方面,杜明书指出新社会阶层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观念等对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发挥着影响。^[12]在外在因素方面,媒介常常被视为影响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这主要是由于媒介为新社会阶层提供了政治信息,构筑了他们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13]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于新社会阶层的传统参政有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对于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研究较少。部分学者虽然在探讨新社会阶层参政渠道时,将网络参政视作新社会阶层的一种参政方式,但并没有深入展开研究。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现状问题、表现特征和影响因素等尚处于研究空白。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江苏新社会阶层人士的问卷调查,考察和分析当前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江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民营企业发达、外商投资活跃,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我国新社会阶层人士主要集中地区之一。因此,江苏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情况具有很强的代

表性,对该地区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研究,能够为全国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管理和引导工作提供启发。

(一)数据收集。在江苏省委统战部的支持下,课题组于2018年6-8月对苏州、盐城、宿迁、泰州、连云港、扬州、镇江、南通、徐州等江苏13个省辖市的新社会阶层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80份。

(二)研究变量。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政治认同、媒介依赖和网络参政四项。其中,网络参政是因变量。人口学变量、政治认同和媒介依赖是自变量。下文简述各变量的测量方式。1.人口学变量。本研究所采取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地区、海外经历六类。2.政治认同。本研究对于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测量由三个维度构成,分别是制度认同、政党认同和执政认同。“制度认同”主要测量新社会阶层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情况。“政党认同”主要测量新社会阶层对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情况。“执政认同”主要测量新社会阶层对于政府在住房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食品监管等方面执政能力的认同情况。3.媒介依赖。媒介依赖主要测量新社会阶层对于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四种媒体的依赖程度。4.网络政治参与。参考过往研究文献,本研究对于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测量,最终由以下五个题项构成:①您通过网络就公共事件发表看法的频率如何?②您通过网络向有关部门表达对公共事件的意见的频率如何?③您通过网络参与有关公共事件的投票的频率如何?④您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的频率如何?⑤您通过网络向朋友转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频率如何?受访者从“很少、较少、一般、较常、经常”五个选项中,选择一个进行填答,分别记为1—5分(1表示“很少”,5表示“经常”)。受访者回答这五个题项的总分除以5,即为他们网络参政的最终测量值。

四、研究发现

(一)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现状

在网络参政程度上,经SPSS计算,新社会阶

层人士网络参政的总体得分均值为2.5分,男女之间无差异,均值也都为2.5分。

从人口分布来看,随着网络参政程度的加深,新社会阶层人数在减少。根据统计,网络参政得分在1-2分之间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占比高达40.3%,说明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很少”和“较少”进行网络参政。网络参政得分在2-3分之间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占比第二多,为31.2%。网络参政得分在3-4分和4分以上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占比仅为21.3%和7.2%。这样的结果表明,新社会阶层中仅有少数(7.2%)的人士经常性进行网络参政,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频率不高。

从年龄分布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统计,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程度最深,均值达2.76,远高于整体均值(2.5)。这说明网络参政主要为年轻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此外,“35岁”是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分水岭。年龄超过35岁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其网络参政的均值都低于平均值(2.5)。“35-40岁”、“40-45岁”、“45-50岁”、“50-55岁”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均值依次递减,分别为2.41、2.40、2.20、2.01。“55-60岁”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均值有所上升,但也没超过整体均值,仅为2.49。

从教育分布来看,“本科生”既是新社会阶层的主力群体(占比62%),也是网络参政程度最深的群体(均值为2.55)。此外,教育程度较低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小学及以下、高中或中专),他们的网络参政程度也比较高,分别达到2.50和2.48,但他们的人口占比非常小,仅为0.4%和3.9%。

从收入分布来看,年收入最高(50万以上)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他们的网络参政程度最高,均值达2.83,不过他们的占比很小,仅为1%。总体来看,除去1%的高收入新社会阶层人士,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程度随着收入的上升呈下降的趋势。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的新

社会阶层人士比经济发展程度低地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程度高。苏南地区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程度最高,均值为 2.62;苏中地区次之,均值为 2.38;苏北地区最低,均值为 2.29。

最后,从海外经历来看,无海外经历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其网络参政的程度(均值 2.51)要高于有海外经历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均值为 2.39)。

综上,我们可以概括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网络参政特征如下:1、新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网络参政的经历,但绝大多数人的网络参政程度并不高,男性和女性在网络参政程度上没有差异。2、经济越发达地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其网络参政程度也越高。3、新社会阶层中“年轻(20-25岁)”、“本科学历”、“收入偏低或较高(5万以下、50万以上)”、“无海外经历”的人士,他们网络参政程度比较高。

(二)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参政的影响因素

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阶层回归分析

自变量\因变量	网络政治参与
第一阶层(人口学变量)	
性别	-1.16
年龄	-2.45*
文化程度	0.18
海外经历	0.62
个人收入	0.81
修正的 R ² (%)	3.4
第二阶层(政治认同)	
制度认同	2.25*
政党认同	-2.11*
执政认同	1.52
修正的 R ² (%)增加	1.5
第三阶层(媒介依赖)	
报纸依赖	1.58
广播依赖	2.33*
电视依赖	2.80*
网络依赖	8.01***
修正的 R ² (%)增加	8.5
修正的 R ² (%)总和	13.4

注:1. 表内数字为所有变量均输入回归方程后,最终的标准化回归系数(Final Beta)。

2.*P<0.05,**P<0.01,***P<0.001。

本研究通过阶层回归的分析方法,检视了人口学变量、政治认同和媒介依赖对于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影响,上表为阶层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首先,人口学变量对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预测力很弱,仅年龄对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有反向预测力(Beta=-2.45, P<0.05),即年龄越大,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程度越低。其次,政治认同对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其中,制度认同对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具有正向预测力,即新社会阶层对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感越高,他们网络参政的程度越强(Beta=2.25, P<0.05)。政党认同对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具有反向预测力,即新社会阶层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认可,他们网络参政的程度就越低(Beta=-2.11, P<0.05)。新社会阶层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同情况,对他们网络参政不形成影响。最后,媒介依赖对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预测力非常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广播依赖、电视依赖和网络依赖均对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具有正向预测力。其中,网络依赖的预测力最强(Beta=8.01, P<0.001),电视依赖次之(Beta=2.80, P<0.05),广播再次之(Beta=2.33, P<0.05)。报纸依赖对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无显著预测力。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新社会阶层群体不断扩大,他们在社会中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何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引导他们理性参政、有序参政,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本研究以江苏新社会阶层人士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探讨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网络参政问题,得到如下发现。

第一,目前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整体网络参政程度不算高,但在群体内部,他们的网络参政已经出现分化的情况。年纪轻、学历高、收入处于两极(较高或较低)、无海外经历、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他们的网络参政程度较高。

第二,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网络参政,受他们政

治认同情况的影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度越高,就越激发他们网络参政的行为。而他们对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度越高,他们的网络参政程度则越低。他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程度,并不影响他们的网络参政行为。这说明,新社会阶层的网络参政更多的是受主观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激发,而不是受客观政治现状(执政状况)的影响。

第三,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网络参政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大于内在因素。研究发现,媒介依赖对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影响最大。新社会阶层对媒介依赖的程度越深,尤其是对互联网依赖的程度越深,他们网络参政的程度也越深。这说明,媒介通过为新社会阶层提供信息、观点和渠道,从而成为新社会阶层网络参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 [1] 唐若兰.我国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及社会功能探析[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8(3):83-88.
- [2] 郑曙村,郭永奎.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需求及其引导[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111-115.
- [3] 齐杏发.新社会阶层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意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2):1-5.
- [4] 王邦佐,谢岳.新社会阶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J].政治学研究,2006(2):38-43.
- [5] 杨艳东,陈明丽.论新媒体时代新社会阶层的有序政治参与[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2):53-57.
- [6]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86-99.
- [7] 熊光清.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J].社会科学,2012(1):23-31.
- [8] 张明新.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49-57.
- [9] 郭小安.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J].理论探索,2008(3):127-129.
- [10] 文道贵,陈志宇.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及执政党的政策引导[J].社会主义研究,2005(6):57-59.
- [11] 韩影.当代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研究[J].理论界,2011(9).
- [12] 杜明书.新的社会阶层与政治参与[J].求索,2009(7).
- [13] 曾凡斌.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200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数据[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10):33-40.

责任编辑:蒋建忠

扩大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参与 推动妇联组织改革

雷明贵

摘要:妇联组织改革要回归组织宗旨,回应女性群体参与的内在特点与需求。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考察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公民参与情况及其对妇联改革的新要求。提出妇联要从职能定位、组织架构、行为方式上进行整体改革。在职能定位上,要代表女性与围绕中心;在组织架构上,要理顺体制与强基固本;在行为模式上,要内部挖潜与建构网络。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参与;妇联组织;群团改革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44-04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自 2015 年首次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并特别提出“要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到 2017 年习近平对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的指示“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要求,再到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颁布,包括妇联组织改革在内的群团组织改革已经具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妇联组织改革即将从零星试点进入全面推进时期。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妇联组织要进一步理清此次机构改革的基本定位、重点难点,从制度和能力等基本方面优化改革,增进其作为桥梁纽带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效能。

总体来看,妇联组织改革的研究从组织发展的历史逻辑、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以及组织行为的行动者逻辑出发进行多个层面的探讨,但缺乏从妇联组织直接服务对象的女性群体角度进行的研究。本论文以一项基于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参与的特点,探讨女性群体参与状况对妇联组织改革的内在诉求以及妇联组织改革的未来取向。总体来看,社团组织的职能更多地从政治整合转向社会治理,而以女性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妇联,如何回应女性群体参与的需求,吸纳和引领女性群体的“民意”,履行好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职能,是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

二、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参与状况

收稿日期:2019-06-11

作者简介:雷明贵,女,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统战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层治理的合作网络研究》(项目编号:14YBA249)成果之一;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咨项目前期成果(课题编号:JYZ201903)。

本文将公共参与限定为包括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在内的参与行为,既包括参加公共部门的咨询、听证等具有政治性的行为,也包括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等纯粹社会服务行为,特别是重点关注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女性社会参与状况。

(一)样本概况

本研究对象是新的社会阶层群体,本次研究共收集总样本657份。从职业、收入及受教育状况方面综合评价,全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其中男、女性分别为309、348人。职业上以体制外为主,其中个体/私营企业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自由择业人员占98%。在总样本中,348名女性为有效样本,而男性则为对照群体。一方面可以用来描述新的社会阶层中女性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比较两性在社会治理参与方面的异同。

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着社会分化的发展取向,正是此部分群体构成妇联组织改革的重要动力,因而研究新的社会阶层中女性群体参与状况仍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二)女性群体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态度

对社会治理的认知直接影响着女性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与力度。当被问及“谁是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时,女性选择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政府”(88.5%)、“社会组织”(56%)、“社区”(55.2%),也就是说女性认为社会组织是相比社区而言更加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这对妇联作为社会组织独自发挥作用,或联系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发挥作用提出了要求。

关于当前社会治理难点问题的描述中,女性排名居前的分别是“政府社会治理履职不充分”(62.1%)、“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59.5%),这表明女性关注到了公众参与状况影响社会治理实效。而男性对此问题的回答中居第二位的选项则是“社会治理体制有待理顺”,追究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在被问及“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时,男女两性的一、二选项均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就业和失业问题”,这说明对新社会阶层而

言,最令他们关切的是与基本生存保障、职业发展等问题。除了上述微弱差异之外,男女两性对“谁是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难点问题”、“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等问题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妇联组织发挥政治中介功能,引导和推动公共政策议程提出了要求,即更好地传达、回应、代表各个群体的需求,开展有效的服务。

(三)女性群体社会参与情况

女性对社会治理的认知只是影响其社会参与的原因之一,其实际的社会参与情况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女性在社会治理公民参与方面,选项居前三位的分别是“观看政治类电视节目、浏览政治类新闻”(74.7%)、“向慈善组织捐款、捐物”(60.6%)、“在网络上发表、转发对时政热点事件的评论”(52%)。男性在此问题上的选项排序基本一致,但比较而言,女性选择“观看政治类电视节目、浏览政治类新闻”、“向慈善组织捐款、捐物”的比例均要高于男性。

男女两性对于“没有参与公共部门组织活动原因”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具体对比差异可知:针对不参与公共部门活动的原因,女性更可能完全不知道相关社会治理活动信息,男性群体认为意见征集时间过短、会议地点不方便、不让提出意见等原因导致自己不参与公共部门活动。这对公共部门组织和发起相应的公民参与活动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四)女性群体参与的方式与途径

不同性别人群在“参与社会政策及相关公共政策途径”、“未来可能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等问题选项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对于参与社会政策及相关公共政策途径上,男性相对更可能参与听证会、座谈会,而女性群体通过网上意见征集,微博微信这两种网络形式参与相关公共政策途径的可能性会更高。对于参与社会治理方式上,男性更可能参与专业性社会组织、通过正式的参政议政渠道这两种形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就志愿服务活动等社会参与类型及频次来说,女性参加 1~2 次由民间公益机构发起的志愿服务活动、由单位发起的志愿服务活动的频率更高,对于居住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男性的参与频次则明显高于女性。

(五)女性群体网络参与状况

就网络参与总体状况而言,男女两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网络社会中女性群体“浏览信息”的比率更高,而“发布或转发信息”、“投诉举报、反映问题”、“网络社区讨论”的比率相对较低。就自身的网络参与状况对事件处理的影响来看,女性较男性有相对积极的态度,有 51.7% 的样本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会对事件处理有积极的影响”观点,认为“根本不会有影响”者也较男性稍低。就政府通过网络与公民互动,女性持更为积极正面的态度。当被问及“是否会因为网络信息而发表言论或采取实际行动”时,有超过 80% 的受访者会注意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即对网络信息采取较为客观的态度,而不会冒然行动,这也意味着女性的网络参与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力量。

三、回应女性群体参与需求,推进妇联组织改革

妇联和其他人民团体一样,是兼跨国家、市场、社会三大领域的组织体系。“是在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中,通过行政力量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对社会结构进行重塑而形成的一套组织制度体系。”^[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采取的“社会动员”和“管控”取向,及改革开放以来妇联组织改革所特有的“钟摆”现象^[2],共同形塑着妇联组织运作逻辑,影响妇联组织当前的行为选择,并构成妇联组织改革的基本背景。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社会分化的逐步加深,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成长,作为妇联组织直接联系和服务对象的女性群体也在发生变化,女性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在公民参与方面的特点,也是妇联组织改革所需要特别关切的因素,构成组织改革的重要背景因素。

(一)基本职能:代表女性与围绕中心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时期还是进入新时代,妇联作为人民团体的一员,是国家进行社

会整合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妇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指出“要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这意味着妇联组织是党群关系的重要中介,其组织定位和基本职能一以贯之:一方面,妇联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围绕和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这是妇联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妇联组织要履行好“代表妇女”的基本职能,即反映女性群体需求、发挥女性群体作用、代表女性群体利益,这是妇联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基础。

要发挥好“围绕中心”与“代表女性”的双重职能,妇联组织至少有几个方面的角色:一是以女性团体身份在公共政策领域发声。妇联是重要的人民团体,是人民政协的界别之一,可以参与各级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还可以引导其所联系的女性团体参与社会组织协商,就与女性群体相关的议题参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等。作为受党和政府信任的组织,要发挥好政治资源丰富的优势,围绕中心代表女性群体发声,以厚植其群众基础。二是作为社会组织动员和吸纳女性参与社会治理。正如本问卷数据所显示的,女性认可“政府”(88.5%)和“社会组织”(56%)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妇联组织要发挥好其自身作为社会组织的功能,组织和引导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女性较方便参与的公共活动,在此过程中不仅可以培养女性的参与意识,还可以增进社会治理效果。^[3]此外,妇联组织还要在完成党政机构交办的公共服务活动中理顺双重职能。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促进党政机构同群团组织功能有机衔接,支持和鼓励群团组织承担适合其承担的公共职能。”这意味着妇联组织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沟通者的角色,要求其不仅要联结党政与群众,也要联结组织与个体,形成沟通联系的重要平台。

(二)组织架构:理顺体制与强基固本

妇联组织在运作上具有科层制特征,其群众工作方式也以动员式为主。这体现在机构上的纵向工作层级,管理上的行政化色彩:在运行经费、干部选任、管理模式上参照政府公务员体系,组织体系上职责同构,讲求“上下对口”。这种组织架构满足了妇联组织对接党政的需要,但同时也容易造成脱离群众的风险。对“群众性”的强调也因此成为历次妇联组织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要体现妇联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就要理顺妇联组织整体架构,发挥全国和省市妇联组织在涉性别公共政策导向、平台建构、服务支持等方面的职能,而强化基层妇联在社会治理、联系和服务群众方面的功能。

2015年以来开展的第五轮妇联组织改革试点大多将基层基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这契合了女性公民参与的内在需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也提出,群团组织要“优化机构设置,完善管理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将力量配备、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更好适应基层和群众需要。”如问卷调查所显示的:对于“未来可能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女性选择“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治理活动”的比例达75%。而就实际公共参与而言,女性选择“由民间公益机构发起的志愿服务活动”、“由所居住社区发起的志愿服务活动”的比率较男性更低。这种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的落差,是妇联组织夯实基层基础的重要契机。

(三)行为模式:内部挖潜与网络建构

“机构设置”只是妇联组织改革的第一步,组织的管理模式及一系列符合利益相关方需求的工作机制才是让组织顺利运作的保证。因此妇联组织改革既要关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走向,也要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研究探讨符合组织能力、群众特点的工作机制当中。如在问卷中受访者对“未来可能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治理”时,女性选择居前一、二位的分别是“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治理活动”(75%)、“通过发起网络公共议题等影响社会治理政策”(65.2%),这意味着拓展

妇联组织工作空间、改革妇联组织行为模式有新的方向。

一是针对女性公民参与多样化的特点,以增强枢纽性功能为要点,建立起与其他女性社会组织的横向联系,满足各类女性群体差异化的需求。在历次妇联组织改革中,“始终担任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但在消除机关化、行政化方面不够成功,谋求大幅度增加社会团体属性与功能,但从未真正变成枢纽型社会组织”^[4]。枢纽型功能是妇联组织履行基本职能的重要前提,是增强组织群众性的必然要求。在工作机制上不仅要便于党的领导和意图的实现,还要便于服务联结妇女群众。在目前通过“精英吸纳”对新生力量进行组织内化的同时,还要通过组织联合等方式,扩大妇联的组织网络。

二是针对女性公民参与方式在地化与网络化的特点,用好网上网下渠道,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领域扩大妇女参与面。正如问卷所显示的,男女两性在现实的社会治理公民参与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参与途径、未来参与取向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如在“听证会”、“座谈会”、“网上意见征集”、“微博、微信”、“信访”等参与途径中,女性更可能选择网络参与。而当被问及“没有参与社会治理相关活动的原因”时,有65.7%的女性“不知道相关信息”。这说明通过互联网等技术化手段扩大女性知晓度,通过优化议题等激发女性的参与热情,可能是扩大女性公民参与的必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陈佳俊,史龙鳞.动员与管控:新中国群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J].社会发展研究,2015(3).
- [2] 毛丹,陈佳俊.制度、行动者与行动选择——L市妇联改革观察[J].社会学研究,2017(5).
- [3] 肖百灵.妇联组织在促进妇女参与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J].湖南社会科学,2007(6).
- [4] 毛丹,陈佳俊.制度、行动者与行动选择——L市妇联改革观察[J].社会学研究,2017(5).

责任编辑:郭晓东

社区变迁视角下的江苏农村基督教发展

朱艳伟 李 雪

摘要: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江苏农村经历着不同形态的社区变迁。农村人口进入城郊以及新农村建设改变了居住空间,使原有的信仰社区被打散,总体上呈现出原生型乡土社区信仰组织、初步城镇化新农村信仰组织和城市化郊区社区信仰组织等三类不同的信仰社区形态,并有前者向后者流动转型的趋势。基督教发展植根于农村社区,在社区变迁视角下考察农村基督教发展,既折射了我国农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有区位不同的个别化问题。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关键词:基督教;社区变迁;发展;信仰社区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48-05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社会持续经历转型与变迁,城乡发展由二元分割逐步走向统筹发展。在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社共同体在城乡流动中趋于消解,个体和家庭生产生活、道德和信仰价值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发展处于互动关系之中的基督教,随着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也在发生着相应的转变。

在经济发展较好、文化传统较为深厚的江苏省,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农村基督教组织一方面呈现出城市化、现代化、行政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城镇化的阶段性差距、

农村文化的不同和宗教发展的地区差异,也使基督教组织形成各自的区位和管理差异。本文的研究立足于江苏省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考量指标的不同地域,以社区变迁为视角,将基督教的发展放置到农村地方社会的脉络中来考察二者的互动关系,重点考察基督教组织在江苏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形态,了解新时期农村居民和信徒群体的需求,分析农村社会中的新问题、农村基督教发展的新趋势,提出有利于农村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和建议。研究采用个案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选取了苏北、苏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6 个县市 12 个基督教堂点进行实地观察和开展个案访谈,另对全省 13 个地市进行分层等比抽样后,在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朱艳伟,爱德基金会研究倡导总监,研究方向为基督教史及宗教公益慈善;李雪,爱德基金会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史。

49个教会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25份。

一、农村基督教的组织类型分析

江苏省基督教活动的地域性特征明显。从全省基督教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进入21世纪后,基督教皈依人数快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目前全省信徒每年增长约3%,与全省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总体相适应。农村基督教信徒仍然是我省基督教信徒主体,苏北地区(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盐城)农村盛行基督教,苏中(扬州、泰州、南通)和苏南地区(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基督教场所和信教人数明显要少得多。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江苏各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城镇居住人口不断增加。农村基督教聚会点的人数整体上呈萎缩态势。政府对农村散居住所进行了清理和统一规划,很多自然村进行了整体搬迁。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和外迁,信仰社区的形态也出现了分化和改变,总体上呈现出原生型乡土社区信仰组织、初步城镇化新农村信仰组织、城市化郊区社区信仰组织等三类不同的信仰社区形态,并有前者向后者流动转型的趋势。

(一)原生型乡土社区信仰组织。此类组织较为明显的特征是以具有领导力的某个家族为核心,信仰传播通过亲族、友邻的方式展开,家庭在信仰社区内部是重要的行动单位。居领头位置的家族成员长期服务于自己所在的信仰社区,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较少地受到外部权力的干预。原生型乡土社区信仰组织体现出较浓厚的乡土特征:社区主要是靠一种类似“乡约”的伦理体系进行自我约束。农村传道人除了信徒的信仰牧养之外,也会牵涉到一些信徒之间的问题解决,但这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社区的传统的亲族资源和熟人网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种“原生态”乡土社区体系因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空间的消失而将逐步趋向于分化瓦解,影响也将逐渐弱化。

(二)初步城镇化新农村信仰组织。此类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经过行政规划和重新布局的新型农村社区环境。原有的乡土文化网络随

着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被一种向现代城市靠拢的新兴农村文化替代。首先,土地经过集中流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小农自有农耕经济逐渐转变为个体私营经济或雇佣型经济(如土地集中流转后,村民们为农场承包经营者打工,成为新型的农场工人)。其次,由于住所的重建和集中,乡村原有的人伦空间也随着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家族和亲族网络进一步向原子化、个体小家庭分化,村民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国家政策、市场规则以及可获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亲族网络、道德威望等乡土文化要素不再是协调社区秩序的力量,行政体系和现代化机制建构了刚性的社区新秩序。在政府的倡导下,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色元素以一种新形式出现在城镇化新农村的一些活动中。在初步城镇化的新农村建设中,基督教重点关注的是场所生存问题,避免在新的社区发展规划中被边缘化,甚至于消失。因此,初步城镇化的新农村基层教会组织,更希望当地政府落实政策,使他们的原有的场所以得保全或在拆迁安置中予以考虑。

(三)城市化郊区社区信仰组织。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和城市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些地区教会的信徒结构和受访的苏北农村教会呈现出相互对应的现象:苏北农村教会60岁以上的老年信众占多数,而苏南城市郊区教会中,50岁以下的青壮年占多数,少数的老年人通常是外来务工青壮年的父母,来帮助子女照看孩子。这是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比例更高,苏北的打工者流动到苏南,从而造成了上述两个地区在信徒构成上的此消彼长的现象。在受访的苏南教会中,外地信徒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在老家就是信徒,少数是来到当地打工以后皈依的。

由于信徒结构的复杂性,城市化郊区的信徒对教会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对于基本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小康阶层信徒,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社会资源的信徒而言,他们对信仰选择更为理性,对牧师和传道人教义的解析和信仰实践有着更高的期望。多数通过打工而定居

下来的信徒群体面临生活和发展层面的问题,包括婚姻家庭、职业变化、子女就学,以及来到城市以后工作和生活的适应问题。因而,城市化郊区社区的教会组织对教职人员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内部管理人员需要在布道、圣乐、教牧心理、教育、甚至社工等专业方面有较为多元的配置。

二、农村基督教发展的特点

当前国内对于农村基督教组织发展的研究,学者对农村基督教信徒的构成特点总结了“四多”的现象,即女性人数多、中老年人数多、低文化水平者多、病弱者多。就本次调研的江苏情况来看,农村信徒仍然以老年人、妇女为主,苏南地区城镇化的农村社区和城市郊区的教会,因为打工人口加入教会,青年信徒的比例相对较高。

(一)皈信原因呈现多样化。一般认为皈依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生病后希望得到医治,带有明确的功利性色彩。从本次问卷的数据来看,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比例最高的是“为了得永生”,占 38%,这种对于终极灵魂关怀的追求显示了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其他方面的皈信原因有:“为了得到身体的医治”占 29%，“受家人和朋友的影响”占 28%，“追求生活平安喜乐”占 13.7%，“喜欢教会里弟兄姊妹间和谐的气氛”占 6.9%。可以看出,虽然希望得到身体的医治仍是信徒皈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其他原因所占比例也在提高。

(二)信徒对教义教规的了解有限。本次调研访谈发现,村一级基督教信仰社区的形成过程基本路径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少数村民开始在家中聚会,由解放前的老信徒提供圣经叙事、赞美歌唱、以及祷告等聚会形式。其中有的聚会点留有一本或残缺不全的旧圣经,有的聚会点则没有圣经,教义的传播依靠口口相传的圣经故事、个人见证和赞美诗。从本次调研的情况来看,信徒对教义教规的了解仍然以口口相传为主。在对圣经知识的了解方面,表示“不太了解”的占 59.5%，“完全不了解”的占 4%，“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占 36.5%。阅读圣经和祷告方面,读过 1 遍

圣经以上的占 32.1%，“尝试过从头到尾读一遍,但坚持不下来”的占 29.2%，“不识字、读不了圣经,只能听讲道”的占 15.6%。

(三)信徒之间有较强的互助关系。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互助关系,在农村中的婚丧嫁娶、生产劳动和生活协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加强,使得传统的互帮互助的互利行为被市场化的劳动交换关系所取代,但是在基督教中,这种传统的互助关系仍然存在,这种互助关系对非信徒的皈信起到一定的吸引作用。徐州 LT 教会从 2000 年至今,一共帮助本村、邻村的五保户、困难户修缮了 200 多间房屋,每年帮助无劳力、无农机的农户干收割、搬运等农活,最多的多达 30 多亩地。滨海县 ZG 教会长期照料困难家庭,其中一个家中无劳力、并患有疾病的妇女得到教会 20 多年无偿照顾,包括盖房子、干农活、资助该妇女的孩子上学等。

(四)信众有着比较高的信仰素养。基层教会的负责人普遍认为,邪教问题的最大受害者是地方三自教会。由于政府持续不断的反邪教宣传,以及信仰社区中不断教化的是非观念,信众群体对邪教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并能够分辨出邪教在教义传播上的不同,这在堂点受访者以及随机路访者的表述中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滨海县寻访到的一位农村教堂的执事,当问到能否辨识邪教时,他说:“因为宣传比较多,群众都能够辨别,有外来传道的都会把他们轰走”。

(五)农村社区邻里矛盾的化解。农村社区属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基于本土的社会文化网络,个体之间有着亲族、朋友、熟人等不同的差序格局关系。农村社区个体或家户之间的日常纠纷,传统上由德高望重的族人或通过双方熟悉的人协调解决。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进展,目前邻里纠纷的解决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目前村内家户纠纷和矛盾的调解,最经常采用的方式是拨打 110,即通过现代治理结构下的行政及执法部门来实现地方秩序。基督徒邻里之间出现纠

纷时,50%以上的受访信徒仍然会寻求村委会村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解决,只有21.6%的到教会找牧师或传道人调解。

三、农村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植根于农村社区,在乡村社区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农村基督教的问题,既折射了我国农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反映出在特定的地区基督教面临的个别性问题。

(一)农村的空心化及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留守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我国农村的养老传统上一直是由其家庭负担,虽然国家对于农村老人的福利保障在提高,但是农村老人的生老病死仍然主要依靠子女解决。老人晚年除了需要生活上的照料之外,更多的还需要心灵上的慰藉。随着传统大家庭结构的解体,以核心家庭为主要构成的农村社区出现了传统孝道的丧失。农村基督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发挥作用,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排忧解难和心灵慰藉的途径,这也是农村基督徒老年信徒比较多的因素之一。

(二)农村文化生活缺乏,日常消遣方式单一。农村缺少文化娱乐生活,虽然目前农村地区基本上普及了电视机,安装网络也很方便,但是缺少具有社交功能的公共文化娱乐生活。农村社区的规划注重实用功能,对社区公共生活需要的公共空间和功能,缺少规划和考虑,更缺少传统的、常态的公共文化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出现填补了农村文化生活的空缺。这也是不少农村信徒对教义教规缺少了解,但是仍然非常忠实地到教会听讲道、做礼拜的原因。

(三)传道人获取职业资格难、收入不稳定是农村教会管理有序发展的阻碍。农村传道人在农村教会中的作用,不仅是使信仰社区内部获得和谐与稳定,他们作为宗教伦理的教育者,还为信徒的精神和日常生活提供教导和慰藉,帮助农民抵御非法行骗活动和邪教。但是,由于绝大部分的基层教职人员仍然没有稳定收入,工资水平甚至远

低于当地最低标准。许多传道人的工作仍属于义务劳动范畴,迫使很多传道人不得通过其他途径赚取收入,既影响自身宗教学识提高,也不利于教会管理。

(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对牧师、传道人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苏南地区城市郊区的基层教会,所在的地区外来人口居多。随着年龄的增加和个人财富的增长,外来人口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由于长期的生活压力得到缓解,不少50岁左右男性的家庭出现了婚姻危机,女性信徒在面临这样的家庭问题时心情苦闷,无处排解。此外,定居后的打工夫妻把业已成年的留守子女接到身边后,也出现多种行为失范。女性信徒在面临这些家庭问题时,常常寻求教会牧师的帮助。面对这些需要心灵辅导、家庭调解和青少年教育的教会工作,牧师、传道人缺少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四、农村基督教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2016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基督教在城乡社区中、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受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农村传统文化和价值缺失、文化生活单调、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宗教问题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重视农村基督教工作,始终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导”字上下功夫,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在农村建立起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良好宗教关系。鼓励和提倡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创建活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发挥宗教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消除那些不利于和谐的因素和现象。

(一)增强服务能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信教

群众也是群众,不少还是生活比较困难、自己或家人身患重疾、遭遇变故的群众,基层社区组织不仅要尊重他们的信仰,注重联系沟通,而且还要真心实意地关心信教群众的生活,加强对困难群众的个性化、人性化帮扶,解决其生活和生产困难。基层社区组织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农民在闲暇时间能够正确地、自主地选择文化生活,减轻精神压力,丰富农民的娱乐形式。每个行政村配设一个文化艺术中心,正常对外开放。选择有一定文艺才能的群众,组成文化宣传队。利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送戏下乡,积极开展民俗活动和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得更热烈隆重,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美德。

(二)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农村社区和谐。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我国50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和优良的文化传统。尊老爱幼、孝敬公婆、邻里和睦等是我国千年来延绵不断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宜居、和谐的现代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振兴的必有之义。基督教在农村社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在中国化方向指引下,可以在社会交往、社会服务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履行责任和义务。

(三)加强依法管理,做好堂点管理工作。基督教堂点数量过多的地方,积极做好信教群众思想工作,采取各种方式逐步调整到合理布局;对内部矛盾突出、不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基督教团体,要加强教育整顿,真正提升基督教团体有效履行职责的能力,协调解决问题突出的堂点的内部矛盾,把有关基督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制止不良现象和行为。强化对基督教教职人员,尤其是传道员的培训,提高其讲道水平;要有计划地选派讲道水平高的人员,定期到农村基督教堂点宣讲,提高信徒素质。

(四)发挥基督教在社会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医疗、教育等是中国基督教传统的服务事工,历史上对我国的医疗和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针对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具有内生性社会服务的要求,引导信教群众更多地投入当地新农村文化建设,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积极作用。在服务过程中要淡化宗教色彩,做到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与宗教目的相分离,恪守人道、公正和中立的原则,不将公益慈善援助用于政治和宗教目的,自觉将公益慈善活动与宗教目的脱钩,确保公益慈善活动的纯洁性。

参考文献:

- [1] 鲍婷婷,冯青青.苏北五市农村留守群体基督教信教情况调查[J].文学教育,2016(12).
- [2] 陈朝辉.影响与对策:农村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对苏北L市农村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3(2).
- [3] 成军芳.农村基督教信仰中的非理性因素分析[J].高等函授学报,2011(6).
- [4] 王琼瑶.我国农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对策思考[J].安徽农学通报,2011(13).
- [5] 丁忠甫.农村基督教扩展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以皖中S村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2).
- [6] 吕朝阳.苏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1999(6).
- [7] 沈桂萍.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J].中国宗教,2018(6):14-17.
- [8] 王伟玲,张国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必须”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3):51-55.
- [9] 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J].人文杂志,2010(2).
- [10] 杨华,欧阳静.信仰基础:理解农民宗教信仰区域差异的一个框架[J].民俗研究,2016(1).
- [11] 张全录.江苏基督教现状及发展趋势[J].唯实,2010(3):83-85.
- [12] 周晓婷,邢超.农村宗教活动的现状及其对治安影响的实证调查研究—以江苏农村地区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5(6):39-42.

责任编辑:徐晓婷

完善宗教中国化的实现机制研究

——以衢州麻蓬村天主教发展史为例

衢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宗教已经成为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同时,宗教似乎已是世界动荡的最大根源之一。宗教只有立足于各国政治、文化、社会,才有生存发展的根基,这也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要求。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基本的宗教政策。衢州麻蓬村天主教已经有近300年的发展史,成功地实现了天主教本地化。本文总结麻蓬村天主教如何实现本地化,研究宗教中国化的实现机制,对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天主教;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4-00053-06

自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开始,“中国化”的问题就出现在宗教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在我国宗教发展史上,已经出现过佛教中国化、儒释道合一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基督教的多次入华之后所面临的抵制与接受的曲折经历,宗教中国化的问题更是吸引了学界与实务部门的关注。一般认为,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宗教要解决“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1]宗教中国化本质是外来宗教要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必须与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相适应,必须在自身的教理、教义、仪式、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改造,在宗教自身中吸纳中国元素,转化为“中国的宗教”,而不是固守自己的形式,一味排斥本地元素的渗透,结果是成为“在中国的宗教”而失

去发展资源,最终离开中国。成功的宗教中国化必然是如同佛教那样,既保持了佛教的特色,又充分吸纳了中国儒家、道家思想的元素,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融入到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国的佛教。

一、宗教中国化的理论阐释

(一)宗教中国化的形式和内涵

一是宗教建筑的中国化。宗教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常性地、在固定场所组织仪式活动,宗教活动场所往往是宗教组织的外在标志。宗教传播过程中,必然将自己特色的宗教建筑带到各地,与本地建筑风格相融合也成为宗教本地化成功与否的判断依据。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传统的建筑风格,这是历史文化的象征,宗教建筑与本地建筑相融合,有

收稿日期:2019-01-05

作者简介:课题组组长,姜裕富;课题组成员,杨川丹、钱勤英、李洁芳。

助于本地群众对宗教的认同。如伊斯兰教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将清真寺与传统园林建筑结合起来;天主教的一些教堂也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格。二是宗教活动仪式中国化。宗教总是通过一定活动仪式来表达自己的教理教义,宗教活动仪式如果能与本地习俗联系起来,有助于宗教的传播。各个地方的婚丧嫁娶、生日、乔迁、节庆等活动都有一定的礼仪,还伴随着特定的程序、语言、服饰、音乐等,这些习俗与某些宗教可能存在差异。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就非常重视与中国习俗的融合,结果就相当成功。三是宗教理论发展的中国化。宗教发展自有其规律,宗教中国化的一个规律就是理论与中国文化的相融,这是宗教中国化的一个前提。认同本教与传播地的文化具有同等地位,是向本地文化学习的动力,也才会有妥协的机会,才会有吸纳其他文化的行动,最终实现宗教本地化。当前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关键在于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等理论中寻找共同资源,以此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四是教职人员的中国化。教职人员、教徒都是中国人,这也是一个宗教实现中国化的标志。与教职人员中国化相对应的是,宗教典籍、宗教术语等也要中国化,方便中国传教人士、信徒交流学习。

(二)宗教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宗教中国化是一个历史必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2]在数百年的宗教中国化历史中,有的宗教成功实现了中国化,有的宗教始终被认为是“洋教”。总结数百年来宗教中国化的过程,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宗教必须促进政治认同。制度化较高的宗教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必然会威胁到当地政治组织的权威,如果不能成为促进政治认同的因素,必然会遭到国家权力的严密防范与控制。历史上中国宗教始终是附属皇权,为巩固帝王政权服务的。魏晋时期的“灭佛”、清初的“礼仪之争”和禁教等,原因在于宗教试图挑战皇权。新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也是因为基督教、天主教成为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外来宗教要在中国传播,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宗

教必须促进文化认同。宗教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文化扩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总是诞生于特定的时空中,在维持宗教特质的前提下,时刻在与这具体时空中的各类文化发生互动,在吸纳、渗透和融和中共存。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就蕴含了不强求一致、允许差异分歧的存在、求同存异、和谐相处的含义。儒家的这种思想与佛教中的“圆融”思想表达了相同的含义,成为两种宗教思想相处、互融的基础。于是,就有了中国化的佛教义理,中国化的佛教神灵信仰结构,中国化的佛教伦理道德,中国化的佛教文学艺术,中国化的佛教制度、教仪和生活。^[3]三是要促进社会认同。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受制于社会群体、社会规则、社会心理等因素,宗教与它们高度兼容之时,宗教与社会相互认同,宗教就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力量。宗教中国化是外来宗教吸收中国元素,丰富与充实宗教的教义、制度、组织等,成为中国的宗教,而不是宗教改变中国,或者中国宗教化。当然,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中吸收了宗教元素,使中国文化多元化,也使中国宗教谱系更加丰富多彩。

二、衢州天主教的发展史及其经验意义

(一)衢州天主教的发展

麻蓬村位于衢州柯城区北部约 11 公里处,现由三个自然村组成。村里以种植桔子、水稻为主。雍正末年,江西南丰天主教徒傅佑我、傅佑仁兄弟 6 人,为了躲避教难到衢县石梁做佣工。兄弟为人忠厚,做事勤快,深得东家信任,让其兄弟们在石梁溪边租地种植苧麻,并在田地边居住下来,一些天主教徒陆续迁徙过来,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天主教村落。因为他们种麻住蓬,当地人称为麻蓬。麻蓬村的天主教至今已有 300 年的历史,全村 1000 余人几乎都是天主教徒,宗教已经完全地融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之中,实现了天主教中国化。

傅氏兄弟背井离乡,不是到衢州来传教,是因宗教迫害而致的。天主教徒身份的烙印注定要求傅氏兄弟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在刚到麻蓬时,傅氏兄弟相当长时间内不敢透露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不敢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只能悄悄地表

达自己的宗教信仰。1730到1838年间,衢州的天主教徒只能秘密到福建穆阳请神父来麻蓬上会,但天主教还是在衢州扎根下来。道光年间已放松禁教,鸦片战争以后各种不平等条约规定了通商口岸信仰自由,衢州的天主教进入发展时期。到1872年,衢州共有天主教徒411人,其中麻蓬村就有216人。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衢州天主教深受影响。麻蓬信徒王霭堂的眼球被挖,后街巷信徒柴元盛儿子被斩。衢州教案被平息后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30余年,才是衢州天主教的黄金期,其间衢州各地建有教堂十余处,有教徒4000余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天主教活动基本销声匿迹。宗教财产被没收,教徒也被抄家,宗教用品被焚烧或砸毁,麻蓬村教堂也被征用为战备仓库。1979年以后,麻蓬村的天主教活动又逐渐趋于公开,到1985年,天主教徒2700人左右。但衢州的天主教发展速度整体趋缓,至今仅有教徒6000余人,其中麻蓬周边村落就有2000余人。到如今,全村1100左右人口中,有超过1000人是天主教徒。其实,除了村里29名党员以外(这些党员刚出生时,也是被洗礼的),基本上是天主教徒。

衢州一直以来是水稻种植区,土质又适宜种植桔子。傅氏兄弟定居麻蓬后,渐渐放弃了种麻,与周边农民一样,开始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桔子。到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种植结构调整以种植桔子为主,兼种水稻。起初,教徒们对种植结构的变化有抵触,因为种植桔子是以商品化为目的的,有悖于传统的教义。从湖州请来的神父周于德就鼓励大家种植桔子,说天主是允许大家致富的。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麻蓬村与衢州地区多数农村一样,经济结构趋于多元化。当前,由于柑橘效益下降,全村几乎没有人再专门种植柑橘了,剩余劳力以外出务工为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对麻蓬村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方式影响很大。越来越世俗化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生活方式,是经济发展中麻蓬村天主教与周边环境互动的结果。

(二)衢州麻蓬村天主教本土化的基本策略

自利玛窦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华的传播已有430余年的历史,但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接纳。其根本原因,一是基督宗教对中华5000年文明和优秀文化的排斥和疏远;二是对中国行政资源的轻视和背离。^[4]拒绝中国化的基督宗教,即便在鸦片战争后能凭借帝国武力后盾也未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之中。麻蓬天主教发展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宗教接纳与认同不是靠武力支撑的,麻蓬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成功策略,对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启发意义。天主教融入当地的基本策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天主教教义教规的重新解释或者变通执行来影响社会。傅氏兄弟在麻蓬传播天主教教义时,将“天主”与“皇帝”、“信徒”与“臣民”等联系起来,将“十诫”与“国法家规”等等同起来,消除了天主教与皇权观念、地方传统之间的张力,提高了天主教在麻蓬村的影响力。非教徒也将耶稣基督、圣母作为“菩萨”来祭拜,求主保佑。天主教信仰与民间信仰、教义教规与儒家伦理道德融合在一起,成为村民共同的道德准则。

二是通过宗教话语的转变提高与村民交流的机会。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话语的一致有助于提高心理上接近、身份上的认同、文化上的交往,由于方言上的差异造成的误会是经济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通过语言的转变是天主教在提高与麻蓬村交流的重要途径。麻蓬村天主教教徒使用的方言是江西南丰腔,麻蓬村人使用的是衢州方言。由于语言上的隔阂,双方交流就更少了。因此傅姓天主教徒们积极主动改变自己宗教教义、教规以及婚姻传统、生活习俗等,两大姓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得到了全面扩展,相互间学习对方语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现在麻蓬村及周边村落,基本上通晓南丰话和衢州话两种方言。

三是通过宗教仪式的变化来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文化传统,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麻蓬村天主教徒们对教义教规进行了许多的适应性变革。第一,放开了天主教关于婚姻的限制。傅氏兄弟等刚到麻蓬时,是禁止与非天

主教徒通婚的,婚姻关系只限于教内,青年男女婚恋对象的选择局限于城内的几家天主教徒。后来,逐渐放宽了限制,允许教内与教外、跨教的婚姻关系。婚姻是社会关系融合的最好凝结剂,允许通婚后,麻蓬村天主教徒的生存环境明显得到了改善。第二,采用儒家的节令、惯习来举行宗教仪式。天主教徒是明确反对祭祖以及祭祖时的各种惯习的,像点蜡烛、磕头之类仪式也是禁止的。不敬祖是中国非信教群众深恶痛绝的,也是相互敌视的根源之一。后来,教徒们也允许在用唱歌、点蜡烛、点香火的方式来祭奠祖先,同时又用宗教的各种咏唱方式,形成了一种由各种信仰表达方式的综合体,化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壑。天主教和儒家习俗中都有不同节日,但儒家习俗大多与农业生产时令相吻合,除了举行天主教的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圣诞节四大节日外,他们还按照周边村民的习惯进行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和除夕的庆典活动。第三,改革天主教仪式的举行方式。为了适应世俗生活的需要,严格的宗教仪式也进行了改革。如天主教规定斋月里是不得举行婚配仪式的;老人去世的当晚教友必须去他家念“通功经”,第二天请神父做弥撒后才能送火化,第三天送骨灰上山。后来,斋月不能举行婚配的禁令取消,葬礼的仪式采用了儒家习惯的灵堂布置、跪拜亲属等仪式。以往做弥撒时必须有的捐献也改为自愿。

四是通过民间文化形式来表达天主教的教义教规。麻蓬村教徒们采用耕种民间文化的形式来表达宗教教义是宗教本地化的重要形式。用本地的话语形式来诵经是天主教本地化的具体表现,特别是把十诫的内容结合当地的习俗、伦理来编唱,颂扬孝顺父母、不可贪心的内容。

五是通过民主介入参与公共事务。麻蓬村是个典型的宗教社区,共同的宗教信仰造就了村内共同的规则意识,成为村庄公共秩序稳定因素。特殊的身份使得麻蓬村的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天主教教会有着许多重合。在近 300 年的麻蓬天主教发展史中,不干涉世俗事务是它们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政教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村里的公

共生活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涉及村庄政治的由村两委组织协调,涉及宗教事务的由教会长老负责,二者互不干涉。^[5]事实上,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宗教形成的文化、心理等,对村务管理的影响非常大。教徒也重视利用自治权利来为宗教发展谋求利益。自治组织在组织选举时,重视利用宗教感情来获取选票,利用宗教规则来管理村务。宗教与行政的良好关系,达到了互助合作的效果。

三、完善宗教中国化实现机制的路径

“宗教中国化”和“宗教本地化”,都强调宗教必须适应其生存的环境,主动融入当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中。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中国化”和“宗教本地化”概念等同。天主教出现在麻蓬及周边农村之始,在与农村社会的不断互动之中,便同步开启了天主教麻蓬化、麻蓬天主教中国化的历程,麻蓬村天主教的本地化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有普遍意义的范本。

(一)要加强宗教中国化理论研究,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

尽管外来宗教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但对宗教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却长期滞后于实践,也就无法有效地指导宗教工作实践。宗教中国化研究涉及的理论问题有宗教中国化的内容、方式机制的问题,以及党员不能信教、宗教工作法治化等宗教政策问题,理论与现实问题是相互渗透的,不能片面地研究。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回答有神还是无神的学说、宗教的功能、宗教事务管理等,都是宗教中国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尽管宗教首先是一种解释精神世界的学说,但宗教总是与信徒、宗教组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它们来展示自己的学说及其影响力。宗教的作用总是通过世俗社会来展示,宗教与政治组织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政教关系的问题是理论上需要阐释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实务工作。西方国家强调政教关系,是因为宗教与政治关系是经历残酷的斗争之后才理顺的,我国重视政教关系关键在于宗教的政治认同问题,一是因为历史上宗

教并未形成宗教与政治并驾齐驱的局面,宗教一直是附属于政治的存在;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宗教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融合于中华文化之中;三是因为近代以来出现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来渗透中国社会,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正统性。理论上认清了我国政教关系的实质,才能正确制定宗教政策,不至于将宗教视为一种敌对势力来控制与防范,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来管理宗教事务

宗教中国化是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这就需要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来管理宗教事务。宗教工作法治化是建立在现有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社会基础之上,盲目地照搬他国的宗教管理或法律制度体系,是违背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原则,是违背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必须以党的宗教政策为指导,不断完善宗教法律制度体系,坚持依法行政,着力提高宗教工作队伍综合素质,改善宗教法治化的社会氛围。

制定完善的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的前提。宗教行政部门或者地方立法部门,可以从本地宗教事务管理出发,可以在具体事务权限内,完善对教职人员、宗教场所、宗教活动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规范行政权力自由裁量的运行空间,保障宗教事务管理最终走向法治化。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关键是宗教事务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按照法治原则来处理宗教事务,协调好宗教与行政关系。教职人员是宗教法治的实践者,必须组织教职人员以及信徒学习法律知识和宗教的教规教义,正确处理好法律与教规之间的关系,严格按照法律和教规的规定开展宗教活动,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的建设

宗教工作队伍包括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教职人员和信徒三支队伍。教职人员分布在三支队伍之中,在宗教工作

中居于关键的地位,这支队伍的建设直接关系宗教中国化的质量。宗教中国化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教职人员中国化的程度。

在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中的教职人员,是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和精英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中,曾经严格掌控着宗教团体、宗教组织中层级较高的教职人员培养、任免工作,通过他们控制着宗教的发展,阻扰宗教中国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三自”运动阻断了外国宗教组织对国内宗教组织的掌控,宗教中国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宗教中国化目标是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不是取缔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教职人员更熟悉中国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能对教义教规作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阐释。

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政府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发挥其在宗教内部事务治理中的功能,把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教职人员纳入领导班子。以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来抓好教职人员队伍建设。鼓励教职人员通过钻研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对那些不符合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教义教规进行重新阐释,坚决摒弃宗教极端化的思想内容。

(四)完善宗教之间对话机制,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

建立宗教中国化的对话机制,就是要在不同宗教之间建立如何凝聚共识的平台,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大背景、大平台中,建立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的机制,使宗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对话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尊重机制。不同宗教都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对精神世界的解释方式,本身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不同的宗教类型都应该相互理解与尊重,这是相互之间对话的前提。二是相互沟通交流的渠道。对话机制建设的本质就是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不同宗教之间应该是展示自己对人生、

世界的理解,获取对方的认同,不同宗教之间学会了相互欣赏,才会产生信任,而不是纠缠于各自信仰的正统与否、观点的正确与否,通过理智、平和的方式陈述自己的观点,放弃宗教对抗,才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三是利益保护机制。宗教关系的本质是群众关系,强调了信教的主体是群众,更突出了群众背后利益关系的实质。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上终极关怀,关系到信徒从生到死、从有限到无限的全过程,包含了物质与精神的方方面面,这是群众利益所在。要尊重和保障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加强信教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信教群体的宗教引领。四要建设宗教对话的平台。宗教交流最终还是要要在世俗社会展开,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陈述本教的教义教理,增进理解。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有效地促进了全球对中国文化、中国宗教的理解和交流。以更开放的视野,举办各种形式、层级的宗教交流会议,将是促进宗教和谐关系,遏制极端宗教、凝聚共识、化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五)加强宗教中国化社会基础建设,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优良的社会环境

宗教中国化不是纯粹理论上的思考,要体现在宗教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之中。要把中国化融入教徒的生活之中,要把中国的生活元素融入宗教的教理和制度之中。加强宗教中国化社会基础建设,第一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和教育信教群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信教群体与非信教群体共同的价值规范、行为规范,夯实宗教中国化的文化基础。第二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用优秀文化来熏陶、引导信教群体。中华民族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团结、宽容、和平等思想内涵,这些元素应该成为宗教教义、教理、制度、仪式的重要来源,应该成为宗教中国化的“化”的核心。第三要重在化人。宗教在中国传播,是通过把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化”为宗教的信徒,宗教中国化的目的就在于既要保护群众信教

的权利,又要防止宗教把群众“化”为“洋教徒”。只要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化教”与“化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协同推进,宗教中国化就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六)宗教中国化要与时俱进,警惕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各种误区

宗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在华宗教的一种政治定位,就是要解决宗教对中国政治的认同问题。佛教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过于强调自身特色,拒绝与皇权的合作,坚持“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结果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毫无进展。当前在中国存在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等形式,反映的是宗教与中国政治的不合作,拒绝认同中国政治。“宗教中国化,不完全是一个教会自身的、内在的宗教运动,而是一个政治运动。”^[6]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宣传宗教中国化,这是一个政治原则的问题。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种种误解,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是宣扬“宗教去中国化”,鼓吹宗教的独立性,脱离中国现实;二是宣扬“中国宗教化”,不是用宗教来丰富中国文化,而试图以宗教来代替中国文化。三是宗教团体行政化,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宗教事务。四是宗教活动商业化,出现宗教活动场所商业化管理、“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等不正常现象。

参考文献:

- [1] 卓新平.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N].中国民族报,2015-3-17.
- [2] 詹石窗.关于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的几点思考[J].中国宗教,2016(10).
- [3] 方立天.方立天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7-328.
- [4] 王怀茂.中国化将基督宗教稳固建立在中华文化的磐石上[J].中国天主教,2016(6).
- [5] 袁松.天主信仰在乡土社会的嵌入与融合——对浙西传统天主教村落的人类学考察[J].宗教学研究,2011(3).
- [6] 邱永辉.中国宗教报告(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23.

责任编辑:徐晓婷

优秀家规家训是当代政治建设的重要历史文化宝库

李传玺

摘要:本文厘清了家规家训家风的概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六个方面提炼概括了蕴含在优秀家规家训中的精神标识,结合实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优秀家规家训对当代政治建设的价值。优秀家规家训是当代政治建设的重要历史文化宝库,能够从行为主体角度推动培育崇尚自律的精神境界,能够从文化传统角度推动修复崇尚忠诚的心理导向,能够从社会氛围角度推动树立崇尚清廉的社会风尚,能够从健康发展角度推动形成崇尚规矩的言行范式。

关键词:家规;家训;家风;当代政治建设;历史文化宝库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59-06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的中国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家规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具有独特的精神标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当代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家规、家训与家风

(一)家规的含义

家规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对家族或家庭所有成员的规定,是为了顺应民族、国家、时代的需要,保证、促使一个家庭或家族生存、团结和发展,面向家族或家庭所有成员的较为全面的硬性规定。家

规又称族约,往往登载于一个家族或家庭家谱的开篇。它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根本大法 and 纲领性文献。家规随着世家大族的形成而出现,明清以降社会管理基础越发呈现家族化,家族越发重视兴修宗祠修撰家谱,从而逐渐将家规固定下来。

比如望江倪氏家规就分十大类:一重祖宗,二和家室,三肃闺闾,四睦宗族,五勤本业,六崇节俭,七傲游惰,八惩诈伪,九戒烟火,十防盗贼。这份家规由清代安徽著名藏书家、钱币收藏家、金融制度研究大家倪模撰写。在家规最后倪模写道:以上十条皆浅近之言,大雅高明或不屑道,但人家能由此充类,则不失为君子正人……赏罚严明有朝廷之律例,知自立者应能读之,则又无藉兹琐屑矣。^[1]因此,这个家规受到了《安徽通志列传》的高度肯定,被评价为“有裨教化者”。^[2]

收稿日期:2019-04-03

作者简介:李传玺,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

(二) 家训的含义

家训是一个家庭的长辈为使晚辈更好地成长成才,根据自己的经验或幼者的不足做出的积极教导或训诫。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颜氏家训》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但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中国最早的家训应是《尚书》中的“诰”类篇章,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帝王家庭的教育训诫言论才有可能被史家记载下来。帝王以下的家训,从文字记载的角度看,较早的有孔子家族的家训。孔子家族最早的家训有两则,一是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在家庙鼎上所铸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饔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3]二是孔子给儿子孔鲤的教训。《论语》记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4]“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就是孔子给儿子的家训。

(三) 家风的含义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能够代代相传或能够被它的成员自觉承续下去的良好风尚与传统。我们一说到包氏家族,就会想到它清廉公正的家风。而这种家风的形成就来自于包拯的两则家训,以及整个家族及其后人对这两则家训的自觉遵守与践行。包拯这两则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貽来者羞。”^[5]前则就刻在包公祠的墙壁上,昭示着后人,也昭示着世人。当我们今天与包氏后人谈到他们家族的家风时,他们无不能诵,也无不以此家风为傲。

(四) 家规家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家规与家训的区别:一是面与点的不同,家规是根本的、全面的,家训往往

侧重于某一点。二是硬与软的不同,家规带有强制性规定性,犯规往往要受罚,家训往往是软性的,以训导形式出现。三是普遍性与时代性的不同,家规对应社会核心价值观作较为普适性、固定性的规定,家训则带有长对幼的观察,是针对某方面不足,或适应当下社会需要而作出的正面教导。四是形式单一与形式多样的不同,家规往往以家法的形式呈现,家训的形式往往比较活泼,可以是书信、诗词、散文、堂号、对联、对话、行为、图画,甚至是物的形态。比如中纪委推荐的绩溪章氏家训,其中一则就是以图画的形式出现。在湖村章氏支祠前的照壁上画有一只“贪”,这是一种神话中的贪兽,要把天地间所有珍宝都吞进肚中,当看到太阳升起时,它妄想把太阳也吞下去,便直奔太阳而去,结果掉进大海淹死了。章氏先人希望通过这个壁画告诫后人要戒贪。

家规与家训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家规是统领性的,家训是家规某一点的体现、丰富与延伸。顺应时代的家训可能对家规作出创新性的补充,特别是家族中的某个成员有较高威望,并对家族建设作出较大贡献,他的家训一旦得到整个家族的认可,便会在下次建祠修谱时吸纳进去。比如清嘉庆元年丙辰恩科状元赵文楷的家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交不忘旧,言不崇华”^[6],被后人刊刻在《太湖赵氏宗谱》卷首。此后,赵氏后人名人辈出,此家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 家规家训与家风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家规、家训与家风之间的联系:第一,家规家训是字面的,家风则体现在家族、家庭、社会具体活动中;第二,家风是在家规家训的训育下,即家庭或家族所有成员自觉遵守家规家训、且代代相沿培植而成;第三,家规家训只有体现于家风才能实现价值,并得以巩固丰富发展下去。

二、家规家训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和魂。优秀传统家规家训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要想使它们在当代开花散叶,

在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从政者身上附体聚神，能够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实现顺利对接，充分发挥其价值，我们首先必须分析清楚它们的精神标识。

(一) 忠诚

传统优秀家规家训中充满浓厚的忠诚教训，这是在家国问题上的根本态度。忠诚往往是下对上，幼对长，从属对主体的。由此出发，从泛义的角度说，忠诚表现在家族家庭就是子对父的孝顺，表现在社会国家就是对你所供职组织的热爱，对你内心深处遵奉理念的信仰，对祖国民族至死不渝的忠诚，当然在封建社会，忠诚还具体表现为忠君。家规家训中忠君爱国的教训比比皆是。比如中纪委推荐的绩溪章氏家训，其章氏总祠高悬牌匾：清忠，就是告诫章氏后人要清清白白做人，忠心耿耿为国。泾县王氏家族(王稼祥家族)家训开篇即书“忠义为立身之本”，“凡族有登仕版，列戎行者，俱当修职励节，矢忠义以报国家”^[7]。徽州戴氏家族(戴震家族)家训开头便是“忠国爱家”^[8]。怀宁陈氏家族(陈独秀家族)家训也有“治国必忠”之训^[9]。

(二) 敬慎

这是指对待职业的根本态度，包含敬业、勤恳、稳健、审慎等，是无论从事何种正当的职业，都应该采取的职业态度。宣城梅氏家族家训说：“国凡四民，各有端业”，“未有职业不专而克底有成者”^[10]。《倪氏族约》中“勤本业”这样告诫子孙后代：“一时之中，游手游食者，辄数数见之，无收成则诿之于天，而于人事之不至则不知自慙，是尚为能务本业乎？业患不能精，行患不能成，耕牧渔樵何独不然？能用其力，自必有效。不则，卤莽为之，亦卤莽应之。是直自欺自误而已，其何能免于冻馁哉？”“今约：子弟之秀者课之读，次则亦令知书数，成童后即各授一业，使有所趋向，勤者奖之，惰者惩之。是即为家给人足之兆矣。”^[11]太平杜氏家族家训中，在要求“在家者士农工商，亦须安分守己，做个好百姓”的同时，更严格要求“吾族出仕者，无论官阶之大小，须小心翼翼，靖共尔位，毋旷厥官，以自取戾，毋肆贪婪，以玷家声”^[12]。绩溪章氏家族家训出自其始祖章仔钧，虽是从福建移民而来，但靠着家

训的统范，章氏家族很快在绩溪繁衍成名门望族，其家训中也有：“职所当为必竭其力，思不出位无二尔心”^[13]这样的警句。

(三) 清廉

传统家规家训把清廉当作在家族、家庭、社会为人处世，以及出仕后为朝廷效力为国家服务的品格底线。桐城张氏家族家训中反复强调：“人能知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视之当淡，而不必深伎以累心”；“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人能拼命能忍不受非份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14]。宣城梅氏家族家规专门设箴仕一节，谆谆教诲，“吾族仕宦，在官无论科第出身，即委吏乘田，孔子不鄙，但随职尽忠，奉公洁己，便是好官，自当钦敬；若为墨吏，负国殃民，有何面目登会庆之堂，而尚得以缙绅夸族党哉？”^[15]太平崔氏家族(崔国因家族)家训，在借鉴包公家训的基础上，严厉要求后世子孙，吾族“为当时录用者，当以不爱财为先，不爱财则心清，心清则志定，以之为上则忠，以之为下则公，庶无愧于为臣。若犯脏滥者，则不得复归本家。子孙不听吾言，非吾子孙也”。^[16]

(四) 仁恕

传统家规家训中仁恕方面的教导，体现的是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的根本态度。桐城张氏家族家训在这方面也有详尽的要求与劝告，“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此生平得力之处”；“一言一动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于人。凡人看得天下事太容易，由于未曾经历也。待人好为责备之论，由于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圣贤从天性中来；中人以上者，则阅历而后得之”^[17]。张氏家训说明人必须经过生活的磨炼才能取得仁恕修为，而面对生活的磨炼，必须时刻牢记家训中的这两句话来积累增进仁恕。怀宁陈氏家族家训则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角度来强调这一点，并从因果的角度说明只要这样持之以恒，就会获得好的报应，“制行唯严以律己，处世当宽以绳人，苟能行之于久久，当必报之以冥冥”^[18]。寿州孙氏家族家规与之相似：“居心要存仁

厚。勿事残刻奸巧，上亏祖德，下剥削子孙。”^[19]旌德江氏家族家训则从孔子的己所不欲说开去，“言常有余故宜谨，行常不足故宜勉。终身言行不外一恕字。强恕之道，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即俗语所谓将心比心也。吾人处世能从恕道推开去，斯言寡尤行寡悔矣。言有益于人，行有济于人，言焉行焉可也。”^[20]六安朱氏家族（朱蕴山家族）家规则更重视如何将仁恕落实到和邻里信朋友的实际行动中：“一乡之人皆友也，皆宜联也”，“贫贱之交勿以富贵而忘之，患难之交勿以安乐而弃之。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是故与善人交则德日进，与恶人交则德日损。成败之系于友也，君子之行无或蹈与流，岂可忽乎？”^[21]

（五）俭朴

这是整个家族以及每一个成员对待生活的根本态度，几乎所有家规家训都会强调这一点。东至周氏家族家规就“重勤俭”如此规定：“耕读之家勤俭尤为首务。必须饮食有常品，衣服有常式，室庐有常度，男女早作晚息，必有定时。若子弟溺于骄奢，用度无节，必致事蓄无资，渐入邪路，族长父兄应时加教导以警戒之。”^[22]望江何氏家族家规中也有“节义勤俭之规”，“勤俭为成家之本。逐日所用，亦宜节省，量入为出，以适其宜。慎勿侈靡骄奢，博弈饮酒，宴安懒惰。若人心一懒，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万事废矣”^[23]。寿县孙氏家族家规也有“居家宜戒奢靡，崇勤俭，或耕或读，务正业以培根本。”^[24]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更是从此出发，要求家族子弟16岁前连皮毛丝绸衣服也不能穿。合肥李府陈列的李文安撰写的李氏家族家训，仅六字“公直、和睦、勤俭。”^[25]望江倪氏家族祖先、南宋名臣倪思在《经锄堂杂志》训示家人：“俭者，君子之德。世俗以俭为鄙，非远识也。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奢则用不给，奢则贪求，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奢则不可以训子孙。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26]曾国藩更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多名言，如，“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

约。此君子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27]

（六）惜境

惜境指爱惜环境，尊重自然。这是中国传统家规家训中对家族或家族成员所作出的对待环境的要求，也是中国人受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影响所形成的对环境的根本态度，许多家规家训中都有如何对待自身环境的要求与规定。在古人看来，水是财富，水是运程，对待滋养家族的水，家规家训中往往也有使用规定。比如皖南徽州古村落往往以家族聚居，他们通过家规家训来规定水的使用。歙县昌溪临河竖立禁碑，明确标明禁止捕鱼、挖沙、倒垃圾杂物的流域。此外，徽州古村落往往背靠来龙山，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此山不仅是这个家族村落的实际靠山，更是这个家族走向昌盛走向发达的精神支撑。因此，许多家族有立下规约，禁止对此山随意砍伐动土。绩溪龙川胡氏家族更是为此立下了严厉的家规：“自龙须山发脉后，土名正班坞、金紫山一带左右山场，均属为来龙出脉处所。自宋元迄今，子孙隆起者不可悉数，以世代相沿，凡属资字事字等祖产石山，无论众业己业，俱不准取石烧灰，亦不得私卖他姓。所以保祖坟而庇丁命。”并由绩溪县令咸丰七年六月发布告示，宣布：“嗣后如有不肖派丁，沟通顽梗石工，胆敢破禁开矿，许该主等指名禀拿严究，按律重办，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无违。”^[28]其中虽有迷信因素，但由此形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爱惜保护传统，无疑也包含着我们今天提倡生态文明的民族基因。

三、传统优秀家规家训与当代政治建设

任何一种阐释都是对当下的观照，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今我们重新认识传统家规家训，不仅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希望通过挖掘和分析传统优秀家规家训这座历史文化宝库，使其在中国当代政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政治建设的行为主体来说，优秀家规家训能够推动培育崇尚自律的精神境界。政治建设的主体是人，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一个政治场中的单

个人行为主体身边还活跃着依附于他服务于他的小群体。因此,我们在说政治建设的主体时,既要看到这个场中的行为主体,也要看到这个主体因公权力而环绕在他身边的小群体。如果说权力主体是显性的,环绕着他的小群体则是隐性的,他们同样都会对政治建设产生影响,并且体现的是两极同向的放大效应,如果显性主体想在政治建设中体现出正面效应,首先必须学会自律。这个自律包含两方面,一是对自身言行的约束,二是对隐性群体言行的约束。后一个约束也是两方面的,一是对他们作出要求,二是通过自身言行进行示范。优秀家规家训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律意识,增强自律的警觉性,树立良好的家风政风。

有人在分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认为这个“后”既可以指继承衣钵的后人,也可以指继承家族精神传统,将家族带向繁荣昌盛的后人与家风。家规家训的制定和提出,恰恰是为了防止家族精神传统的缺失,因此贯穿家规家训的是家族忧患意识,目的是通过家规家训的教诲,实现每个家族成员的行为自觉和精神自律,从而达到修身齐家的境界。比如,寿州孙氏家族家规写有:“以上十条皆修身齐家之事,举其纲领加以训告之词,吾族人各遵之戒之,庶可保世滋大,是则厚望也夫。”^[29]《倪氏族约》最后也是这般面貌,“以上十条,皆浅近之言,大雅高明或不屑道,但人家能由此充类,则不失为君子正人”,“鄙人固漏,遂以是谆谆也”,“知自立者,应能读之,则又无藉兹琐屑矣”。^[30]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十八大以后抓出的大小老虎,他们在自己的忏悔书中说到堕落的原因基本不外两条,一是放松对自我的约束,二是放纵身边人的约束。读一读传统家规家训,其中的修身齐家之论一定会帮助我们加强自律。同时,学一学古人,对身边人多一

些教训和严格要求,形成新时代的家规家训,对于推进政治建设也大有裨益。

从政治建设的文化传统来说,优秀家规家训能够推动修复崇尚忠诚的心理导向。一个接受一定文化熏陶的民族,在长期的濡化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构成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本质,一旦这个本质发生改变,这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便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甚至断裂。

中国人的忠君爱国心理就是这种深层稳态结构之一。它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家国同型同构,强化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科举把朝廷的主流价值观通过以科取仕的方式散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越到后期,家规家训的内容与主流价值观的联系越紧密。通过这种对应,主流价值观在社会基层得到了彻底且自觉的践行,而家国的同型同构又使得这种践行畅行无阻。

现代以来,这种忠诚观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许多人受实用主义的浸染,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对待国家、民族、人民、政党和领袖也采取“两面人”的态度。表面高呼忠诚,实则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更有必要学习传统优秀家规家训,推动其实行现代转化,以家的名义谆谆教导,用其中蕴含的忠诚思想强化我们正在提倡的对党忠诚、对领袖忠诚、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民族忠诚。

从政治建设的社会氛围来说,优秀家规家训能够推动树立崇尚清廉的社会风尚。中国传统大家族往往在家规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要走清廉之路,真正践行了这些家规家训的大家族,教导培养了一代代的传承者,形成了良好家风,不仅使自己家族绵延发展,而且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一定贡献。习近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规家训,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贯彻结合起来,从政治建设的

社会氛围来说,能够推动树立崇尚清廉的社会风尚,有效遏制腐败的滋生。

从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来说,优秀家规家训能够推动形成崇尚规矩的言行范式。依据主流价值观制定的家规,只要在一个家族得到严格执行,就能够有效训练家族中每个成员的规矩意识。有学者在研究科举时发现,科考中的 600 多位文状元,尽管行政能力有高下,在行政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有大小,但就品格来说,只有个别几位位列奸佞。而家规家训打下的良好的道德基础、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在官员们的品格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望江何氏家族家规专有一条“保守身家之规”,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规定,共八条,“第一不可骗奸人家妻女;第二不可赌博宿娼;第三不可拖欠、包揽、谋领、侵欺钱粮;第四不可炼药烧丹、攘窃诬骗;第五不可强横健讼、斗狠逞凶及扛帮教唆、生事害人;第六不可交接无藉之徒、花哄游荡、不务本等生理及纵容尼姑卖婆于内室往来;第七不可做人慢物、好胜夸能、逆理乱伦、骄奢淫逸;第八不可为贪心所使,专行峻险之途”。^[31]孙家鼐在家训中也明确规定,家族子弟“如有偷、抢、奸等行为,族长有权给予严惩”^[32]。在这些严格家规家训中训练出来的子弟,走向社会后大多具有较强的规矩意识。

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守纪律讲规矩。“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

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明白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有些事该这样做、有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就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来说,认真学习这些优秀家规家训,同样会对守纪律讲规矩产生促进作用,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形成崇尚规矩的言行范式。

参考文献:

- [1][11][30] 倪冷峻等主编.倪氏家谱第一部(上册)[Z].安徽:安徽望江,1997:230-234.
- [2] 刘尚恒,郑玲.安徽藏书家传略[M].安徽:黄山书社,2013:158.
- [3] 左丘明.左传[M].安徽:黄山书社,2014:477.
- [4] 杨伯峻.白话四书[M].湖南:岳麓书社,1989:361.
- [5][6][7][8][9][10][12][13][14][15][16][17][18][20][21][22][25] 李传玺主编.徽风皖训[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124,69,56,65,41,82,106,112,35,82,101,35,41,49,29,3,76.
- [19][24][29][32] 李传玺主编.徽风皖训[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11-17.
- [23][31] 李传玺主编.徽风皖训[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18-21.
- [26][27] 朱明勋编.中国古代家训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51,206.
- [28] 黄来生.绩溪龙川胡氏族规家训.[EB/OL].(2018-07-07).
<http://www.jinciwei.cn/a262527.html>.

责任编辑:宋好

文明对话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

冯永昌

摘要:在文明对话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要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前提,完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为引领,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为保障,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为载体,发展企业主体、壮大文化产业为动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为目标,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和平发展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形成合力。

关键词:文明对话;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65-05

2019年5月15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必须要以文明对话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要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前提,完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为引领,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为保障,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为载体,发展企业主体、壮大文化产业为动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

竞争力为目标,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和平发展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形成合力。

一、要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在文化交流中充满自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民族梦想的载体。要坚信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一)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体现中华文化的气度和胸襟,这也是文化自信的

收稿日期:2019-06-24

作者简介:冯永昌,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统战理论、中华文化、民族宗教研究。

外在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奋斗历史中创造的文化,也是文化交流和融合融合的产物。佛教文化在两汉之际、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与融合,从依附黄老浮屠之辞到师说蜂起、宗派林立,最后儒释道三教合流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来之能化、开放包容的气度和胸襟。

其次,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要对中华文化保有敬意和敬畏,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注意反思文化自闭、摒弃文化自卑、坚定文化自信、防范文化自大。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肇端于明朝海禁的文化自闭,不能睁眼看世界,无法吸收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有识之士面对民族危亡,奋起革新,中国人在不断摸索中找到了适合中华文化土壤的发展道路。历史上的每一次成功探索,都离不开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土壤的回归和坚守。

三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何在文化碰撞中坚守根本、筑牢根基,进一步展现对外传播的魅力,关键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超越历史时空、跨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人文精神挖掘出来、传播出去。

(二)加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结和阐释

加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结和阐释,使带有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先进文化为世界所接受,是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的时代课题。首先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文化强国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和革命精神的有机结合,既有别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又不同于工业革命中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西方文化。二是要筑牢“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创新基础。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的关键都在于创新

和发展。停滞就意味着落伍,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体现出充沛的生命活力。要把握时代脉搏,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新时代的发展成就以文化的方式展示出去。三是要注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结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价值评判标准的集中体现,是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精神与“文明对话”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同其他国家人民所遵循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同构而又高度契合。

二、要以完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为引领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仅是单纯的文化活动,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实力的表现。如何使文化在交流中发挥润物无声的作用,实现以文化人、以文交友、以文取信,防止出现文化误解和战略误判,是一项综合性、长期性工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久久为功。

(一)完善顶层设计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是国家层面的、长期性的设计,要以百年大计的态度审慎对待,既不能急功近利,又要力戒保守自封。在这一设计中,要明确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任务目标,要突出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要体现传承性又要体现时代性。

一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亲诚惠容理念、促进文明互鉴,实现民心相通,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推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与合作。二是要坚持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原则。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国家与政府间文化交流,建立长效机制,进行长期合作;另一方面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共建共享。秉承和而不同、携手共进的理念,发挥中华文化有容乃大的特质,以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方式看待其他文明,充分尊重不同文

明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以文明对话、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消弭文明冲突。三是坚持创新创造、互利共赢的方向。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文化活力,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贸易规则,调动市场主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合理配置市场资源,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将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紧密结合,实现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的协调性、整体性发展,实现国际与国内的互利共赢。四是要把握共识精神、明确发展目标。要准确把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2019 北京共识》精神,不断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秉承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合作理念,将周边国家建设成为文化走出去的文化辐射圈、“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战略依托带,全球成为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

(二)加强统筹协调

统筹协调好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各主体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一是统筹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阶段对外文化交流中,政府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要注重发挥政府的组织性、动员性强的特点,尤其是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在交流初期仍然要发挥政府的破冰作用,待基础较为扎实之后,注重发挥市场主体的快灵优势。在较为成熟的文化交流市场,注重市场资源配置,培育壮大文化交流企业,增强文化自养能力,政府重点发挥综合调控作用。二是要统筹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的文化交流中,地方区隔、部门分散、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文化走出去规模小、乱、散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文化、外事、商务、财政、广电等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做好统筹协调工作,一方面可以防止资源的重复投放和浪费,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可以防止资源分散、形成资源合力。三是要统筹协调好

不同市场主体的关系。我国的文化产业基础薄弱,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创新能力不足,在同西方文化巨头的市场竞争中普遍处于弱势。此外,产品创新能力欠缺造成产品同质化严重,在市场竞争中自我竞争、互相压价的情况普遍存在,反过来又削弱了企业的市场信誉和竞争活力。除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外,仍然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利用政策杠杆引导企业加强创新研发能力建设、诚信意识建设。

三、要以创新体制机制和内容形式为保障

长效体制机制建设是文化交流平稳有序开展坚实保障,一方面要遵循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规律和规则健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国内各地区的良性合作与协调机制。

(一)健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机制

对外要健全完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机制。首先通过签署政府间文件的形式,为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截止 2017 年底我国已经与世界上 157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 800 个^[2]。二是深化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等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通过人文合作为文明对话和文化发展提供长效保障。三是加强高级别文化磋商,通过文化部长会晤等方式推动合作机制发展。四是尊重各国人民的精神创造,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与保护机制,共同保护开发文化遗产和世界遗产。五是支持国家级文化研究机构、文化交流团体、文化基金项目同相关国家的同类型文化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六是通过缔结友好城市等方式加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对内要完善部省合作机制、地方合作机制。一是发挥文化部的牵头协调作用,在政策、资金、项目上进行引导,鼓励各省市在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旅游、文化保护等领域开展区域性合作。二是发挥海外侨胞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独特优势。三是发挥文化研究交流机构和智库的作用,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交流与合作。四是注重挖掘具有国际交流价值的地方文化元素,如妈祖

文化等参与文化交流。

(二)创新交流合作的内容和形式

通过《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6-2017》^[3],我们可以了解到海外受访者眼中的中华文化元素。目前很多的文化交流还停留在文化展演等浅表、单向传播的阶段,缺乏有思考、出思想的深入交流,交流形式也多停留在会议、展演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要突破交流合作中的内容局限性,讲好中国故事,突破对传统文化的简单依赖,加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交流力度,借助新媒体手段,利用好大数据平台,分析交流群体的文化偏好和倾向,融合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传播优势,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



海外受访者眼中的中华文化代表元素

四、要以文化交流品牌建设为抓手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要注重品牌效应,建设一批集中展示中华文化、参与人员众多、深度互动的文化交流品牌。

(一)打造重点交流品牌,强化品牌效应

目前,“欢乐春节”、“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等已成为重要的海外交流品牌活动。其中“欢乐春节”已经开展了数百项活动,成为文化部牵头打造的海外影响最大、覆盖国家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综合性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如 2017 年,“欢乐春

节”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民族音乐作为文化语汇,让白俄罗斯等国家的民众接触到了川剧变脸、南派舞狮等中国民俗文化,为增进中外政治互信、经贸互利、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互办文化节活动,扩大文化交流规模

通过互办文化节(年、季、周、日)等活动,使文化交流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律性开展,扩大交流项目,增加交流内容,吸引更多民众参与。例如,“中华文化年”活动,内容丰富,包括 100 多项体现中华民族艺术特色和当代文化创新成果的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自信、包容、开放、发展的形象。

(三)评选文化使者,培养文化人才

通过共同组织“丝绸之路文化使者”评选等活动,对在文化交流中成绩突出的优秀代表人物予以表彰,形成示范作用和头雁效应。通过对海外优秀汉学家、中华文化研究专家、翻译家、学者进行交流对话和项目资助,促进海外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实施中华文化译介人才发展计划,对中国经典著作、优秀文学作品译介推广进行专项资助,推动中外学术名著和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扩大青年学者交流互访规模,培养青年人才研究兴趣,壮大文化交流队伍。

(四)加强教育合作,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加大国际教育合作。一方面积极“送出去”,让中国的青年学子到海外接受教育、感受文化、传递声音,尤其是做好薄弱地区、非通用语言学习者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请进来”,吸引外国学生来留学、交流,培养一支数量可观、交流深入、知华爱华又能够在所在国家和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文明使者队伍。

五、要以发展文化产业、壮大企业主体为动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各方面共同努力,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利用市场杠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企业是潜力最大的主体,也是文化贸易市场的竞争主体,要让发展文化企业、壮大文化产

业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最具活力的因素。

(一)发展繁荣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链高端,是绿色工业、无烟工业的代表。但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中,我国的市场份额仅占2.5%,不仅与美国的43%差距甚远,也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称。国际文化产业市场的竞争,背后反映的是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要实现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总量达到12万亿元,成为国家支柱产业。发展繁荣文化产业,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重点在于补齐创意研发等方面的短板,支持文化创意、数字文化、文化旅游、演艺娱乐等领域的国际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机制,加快国内“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另一方面,支持各省市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结合地域特色、民族特点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此外还要顺应网络时代发展,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实现文化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二)壮大文化企业主体

我国的文化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还缺乏行业性龙头型企业,“小弱散”企业仍然占据绝大多数,市场竞争力不强,表现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就是“送出去”的多,“卖出去”的少。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于培育外向型骨干企业做出了具体部署,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作用,加快培育一批能与西方跨国文化集团相抗衡的文化龙头企业。一方面,鼓励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资本为纽带开展兼并重组,实现资源整合,推广民族文化品牌;另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文化围绕参与文化贸易,在税收、补贴、融资等

方面取得国有企业同等市场主体地位,加快推动国有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良性合作、齐头并进的文化企业投资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创意、市场两头在外,中国只是生产基地的国际市场分工状态,要完善文化产业链条,创造企业航母,形成一整套从创意、研发到包装宣传再到营销的完整产业链。

(三)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旅游是实现各国民众相亲相通的直接通道。吸引海外游客到中国亲身体验中华文化、感受中国发展、发现中国之美,是体现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是实现从“送出去”、“卖出去”到“带回去”的最优方案。要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大文化旅游合作,尽快实现全面旅游免签证、互为旅游目的地,以人流带动文化流、资金流、贸易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5-16(02).
- [2] 黄发红.数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丰硕成果[EB/OL].(2018-10-29).
http://ydy.lchina.com.cn/2018-10/29/content_68824276.htm.
- [3]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EB/OL].(2018-01-05).http://www.sohu.com/a/214759384_748609.
- [4]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EB/OL].(2017-05-14).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4/c_129604310.htm.

责任编辑:宋好

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新发展刍议

李 锋

摘 要:本研究梳理了江南的地理、行政、经济、文化四种意涵,较为清晰地指出“江南”与“长三角区域”的交集。在此基础上,突破江南文化的宽泛界定,以富庶江南(经济)与诗意江南(文化)的“互嵌”为出发点,重点探讨江南文化对江南经济繁荣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最后,就四种意涵的相互关系,提出江南文化中蕴含的开放、审美、和合三种精神,引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江南文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4-00070-04

2018年6月1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支撑其内在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逻辑。长三角地区与历史上的“江南”有诸多交集,江南文化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江南文化究竟为何,对曾经的江南经济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对当前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有何启示,本文将就这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江南”的四重意涵：“江南”与“长三角地区”的交汇

“江南”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不同的地理指向,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更为复杂的是“江南”并不只是局限于地理范畴,而是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意涵。

(一)地理意涵——地理共同体

从地理意涵上来说,“江南”是长江流域的一个“地理共同体”。江南与“长江”相关,关于江南的大体范围有长江中下游和长江下游两种说法,后来还有仅指苏南及杭嘉湖平原^①。鱼米之乡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丘陵、平原的农田以及密布水系构成共同的地理基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行政意涵——治理共同体

乾隆《江南通志》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江南”的变迁,将“江南”的地域范围追溯到《禹贡》,以扬州为中心,涵括徐州、豫州的部分地区。《江南通志》引用《汉书》的说法,秦朝时以郟郡、泗水、会稽、九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李锋,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江、颍川、砀郡为江南六郡,浙江部分区域逐渐囊括其中。到了唐代设立“江南道”,江南道属地方监察区,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江南东道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北宋时期,江南东道所属区域的地名被“浙”所替代,基本属于两浙路,南宋时偏向于两浙西路。明朝洪武初年建都南京,以应天府等府为直隶,被称为南直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清顺治间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时江南省拆分为“安徽省”、“江苏省”。如今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是各省市互相协作的“城市群”发展模式,重点在于深入探索基于共同治理传统的“治理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方协同发展。

(三)经济意涵——经济共同体

李伯重将江南视为“经济区”^[2],这在历史上也有据可查,“自周官职方,辨九州之地,首列扬州,盖财赋所出,其于藩服为重”,“(乾隆时的江南)其田赋当天下十之三,漕粟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淮浙之盐策关津之征。”^[3]江南的富庶是国家财税的重要来源,具有经济区的特征。李伯重从明清江南经济史角度出发,认为“八府一州(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应天)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从苏州府分离出来的太仓州)”可以作为江南的固定区域,这一地区主要指三角洲或太湖流域,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经济区理论”,李伯重认为这个区域具备构成经济体的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太湖水系将这八府一州连成一个整体;二是这个地区具备高层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 place)功能的大中商业城市——苏州、南京、杭州、松江(明)—上海(清)等,八府一州都是这些高层中心地的经济腹地;三是这些高层中心地中有一个中心(core)—苏州高踞其他中心地之上,苏州是太湖的中心,也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段,位居江南水陆交通网的中心;四是八府一州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八府一州”作为核心区(core area)辐射四周,浙西、安

徽等地得以接入整个区域,形成更大的“江南经济共同体”。在江南经济区,长江以及运河将江南地区连为一个整体,而漕运又将各地经济联系在一起。今天长三角地区交通发达程度远超古代,以上海市为中心、以周边省份重要城市为经济腹地的一体化发展战略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人文意涵——人文共同体

江南文化涵括了儒家礼教与玄学审美,其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三次因为政治动荡而展开的“南迁”。西晋末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徙至金陵(今南京),建立南唐;北宋末,宋高宗渡江,以临安(今杭州)为行都,建立南宋。以第一次南迁为例,北来的士人既带来了中原的儒家文化,也沿用了儒家的治理理念,同时这些士人与江南的山水人文融合,吸纳老庄、佛教形成了玄学思想,“魏晋风度”兴起。西晋衣冠南渡给江南带来了两个向度的影响:思想上,从儒家的一元转向儒释道三元融合,思想更为开放;社会生活上,从伦理主义的“礼”到审美主义的“乐”,使人文品性更为丰富。魏晋风度的“乐”和儒家的“乐”有所不同,更加强调个体主义的的生活方式以及超越人伦社会的精神体验。文化多元主义的“礼”、“乐”并重的人文传统有其更早的渊源,“一方面,江南之地的富庶容易滋生享乐思想,歌舞升平、文恬武嬉是物质丰沛后的自然延续,另一方面,吴越之间以及吴越与其他各国之间的恩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为后世留下深深的影响。”^[4]

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对于江南文化都有相应的传承,有特性,又有共性。《江南通志》认为安徽偏向刚烈的一面,而江苏偏向文弱的一面,但是不管如何“富之”、“教之”两者都是并行不悖的。所谓富之,就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教之,主要是儒家的教化,这种评价不免带有儒家正统观的偏见。虽然不可否认会有因为过度沉迷诗意美学而有“暖风熏得游人醉”之虞,但同样因为人文美学的引导,拓宽了江南制造的品质、品位,满足了江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了江南文明的辉煌。江南文化

是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共同的文化记忆、文化资源，是凝聚共识、汲取养料的精神源泉。四个江南意涵彼此交织，人文江南是四个江南的根与魂。

二、“江南文化”的嵌入性：“江南经济”繁荣的文化解释

江南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的指向是复杂多面的，这对“江南文化”的知识化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江南文化难以形成一个固定的边界、但又资源丰富的事实，也为研究者开启了一扇大门。“江南文化”的研究，可以是纯粹的哲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可涉及与“江南”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化具有嵌入性，就其所嵌入的事件、结构中去考察“江南文化”，或许会是另一种解决“江南文化”边界问题的策略。江南文化是嵌入在具体的经济发展之中的，江南文化形成了具有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江南人文氛围，这种人文氛围使江南经济发展更具文化后劲。

（一）文化的教化传统塑造商人的诚信精神

我们看到徽商、浙商、苏商都有儒商的秉性，都注重于义利并重。诚信的传统，对于江南地区企业家合作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软实力。治理共性上来说，江南工商业的大环境促成了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了政商之间的诚信关系，同时基于区域之间的合作、竞争存在，政府的行为选择上也会尽力去创造良好的工商业发展环境，因此，治理共同体也体现在政府的治理理念上、方式上的相似性，更加容易统筹推动政府间的合作。

（二）文化的兼容并包促进多元思想发展

佛教中国化在江南地区得到了充分发展，而西学进入江南也被很好地吸纳，这种包容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工商文明的发展。这种包容性来自于江南地区因长期经济融合形成的社会融合，民心相通。从上海方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大融合，上海话中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上海、宝山、南汇、昆山、嘉兴、崇明、湖州、无锡、常州、杭州等地方言，占 75%；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等地方言，占 10%；第三是粤语系，

占 10%；第四是其他方言，含苏北语，占 1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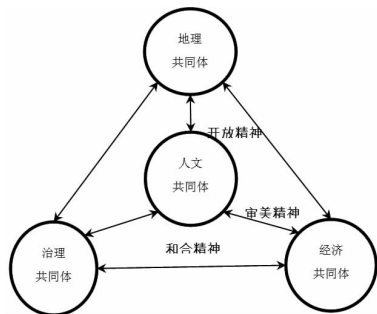
（三）文化的审美传统提升经济品质品位

江南文化独有的审美传统，以及文人和匠人的联合创造，提升了江南的经济品质与品位，再经由商人的交易流通远播全球。南宋时江南制造业就已达较高的水平，禅文化的兴起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产品、生活方式等传播至日韩，茶叶、瓷器、书画、乐器等文化产品，以及豆腐制作、酱油酿造、馒头制作、尺八吹奏等等工艺、技艺广为传播，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济不只是创造财富，同样是创造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江南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不仅要研究经济行为的价值，还要挖掘人文经济的价值。

三、“江南文化”的引领性：开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境界

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研究的策略，跳出单纯基于历史主义的江南文化叙述，在多元主义的研究语境中，回归现实发展之需。通过江南文化理论创新，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建构新时代的江南文化，为长三角区域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生产观念”与“实践性原理”，已成为江南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和当务之急。^[7]

长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力、创新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因此江南文化是以富之为基础，而后有教之、美之。富之与教之的结合，涉及江南文化经济伦理，富之与美之的结合，涉及江南经济形态、经济品质。以人文共同体为核心，四个共同体交互作用，其中蕴含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三种精神。



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三个精神

(一) 开放精神

江南的开放精神源于地理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交融的“水”文化。上善若水,水具有流动性、包容性。流动性、包容性可以诠释开放性,包容代表着多元共存的接纳力、为我所用的吸纳力,流动代表着创新创造之力、自强不息的精进之力,以及润泽万物、惠泽万民的胸襟和气度。江南的水把原来分割的区域联系成一个整体,彼此连接,合作共赢。历史上长三角地区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区,唐宋时代就已有相当的知名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借由内陆联通海外,将开放精神烙印在江南文化血脉之中。

习近平同志盛赞 G20 峰会落实了“西湖风光、江南韵味、中国气派、世界大同”的理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江南韵味是江南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界传播江南文化是彰显中国气派的方式。江南文化并非托于空言,而是要展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和成就,不仅要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要在发展理念上、经济形态上、合作方式上,彰显江南韵味、中国气派,以此建构世界一流城市群的文化形象。讲好江南故事,融入中国故事,融合一带一路战略,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议题。

(二) 审美精神

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不尽相同,从精细制造到精致智造、精美创造,其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审美要求也不断提升。审视当代全球化经济发展,高端产品往往具有高度文化融合的特征,一个品牌绝不仅仅是一个牌子,其中包涵着文化底蕴,从一个牌子我们可以联想到该企业的文化精神等等。^[8]长三角地区应该立志于成为世界高端产品、高端服务的供给地,努力实现从中国制造、中国智造到中国美造的华丽转身。

当我们探求独立的文化产业时,发现在经济的全领域中,文化逐渐繁兴,从制造工艺、工业设计,到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塑造,文化正在全领域融合。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如何用生态、文化相融合的方式来设计产品、规划城市,如何将江南之美体现在日常之中,使其成为代表中国的符号,都应成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着力探讨的问题。

(三) 和合精神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允许不同形态的文化和而不同,鼓励各种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合精神与江南多元并包的文化传统相契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需要继续发扬和合精神。首先,要做到民心 and 合。长三角地区的居民,包括企业家群体之间的和合互信,在区域共同的文化记忆下,共谋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宏伟蓝图。其次,要做到政心和合,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市政府要本着国家战略的目标,增强大局意识,放眼未来,推动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严耀中.江南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2]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7-462.
- [3] 黄之隽.江南通志(卷四)[DB/OL].<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4470&remap=gb>.
- [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9-20.
- [5] 陈望衡.江南文化与中国美学研究(笔谈)——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J].江海学刊,2006(1).
- [6] 刘士林.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论略[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34-38.
- [7] 苏晓静,刘士林.关于江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J].装饰,2017(3).
- [8] 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J].哲学研究,2002(11):68-74.

责任编辑:宋好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和途径研究

——以宿迁学院为例

刘小杰

摘要:本文以宿迁学院为例,从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必要性和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对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对策。通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及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和创业能力。通过开设创业课程、建立创业基金、提供创业咨询等方式,使学生具备创业能力。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现实意义;对策与措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4-00074-03

进入 21 世纪,创新已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国家也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教育先行的政策。因此,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具有高创造力的专业人才,是高校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

(一)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推进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之举。创新是新时代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科技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们国家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是重中之重。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课题,也是高等教育本身要主动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体现。这就必然会促使高校深刻思考在新时代背景下,在教

育理念、教学模式、培养人才上如何下功夫。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大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使创新更好地去促进创业,使创业更好地带动就业,不断地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有利于高校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发挥办学优势。高校良好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相关,高校办学定位要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创新意识,提高创业技能,可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地方企业要积极与高校进行密切合作,搭建平台,提供实习、实训基地,让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施展和提升。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刘小杰,宿迁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宿迁学院第二支委副主委,宿迁学院招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三)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培养创新创业精神,缓解就业压力。随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成果无疑是有益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相关文件中指出,要把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着力点,融入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学生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但是,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不是简单的让学生在在校期间孵化出一个不上规模的小公司或自谋职业,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创业梦想和创业精神,敢于锻炼自己,从而积累经验,提高能力。

二、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对策与措施

宿迁学院是苏北一所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定位为应用技术型学校,属于职业技术学院和高等教育学术性相结合的产物。近年来,随着本地学生生源数量不断增多,为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宿迁学院充分发挥办学优势,注重社会需求,从专业设置、课程教育、人才培养等全方位考虑,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提升创新创业技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一)健全工作机制,构建培养体系

建立领导机构,强化组织保障。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创新教育,为有效开展就业指导和创新创业工作,成立由校领导、有关职能部门和各二级学院领导为成员的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领导小组,由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具体负责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统一组织、综合协调、考核评比和制度建设。各二级学院具体负责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全面负责本院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日常工作,如信息收集整理、发布、就业渠道建立等,负责毕业生的教育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学校将就业创业工作纳入辅导员考核和二级学院考核考评,对各辅导员和二级学院就业创业工作定期检查考核,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各学院相应成立分支机构。初步实现了学校领导小组统筹抓,各二级学院领导小组具体抓的“两级”运作模式。

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创造热情。学院先后

出台了《创新人才培养实施意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实施方案(暂行)》、《大学生创业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各专业根据其自身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方案,细化训练目标和相关要求。此外,还出台了《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本科生创新学分认定办法(试行)》等文件,对学生创造发明、参加学科竞赛获奖、发表作品等,不仅给予精神鼓励,而且给予物质奖励,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和创造发明,有效激发了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热情。

构筑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依托校内实验室、工作室及校外高新技术企业,建设创新创业教育基地,着力构筑实践平台,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各专业建立覆盖到全校学生的科研型、科技活动型、自选实验项目型和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型等多种项目形式的实验室开放制度,实践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制度,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和创新创业训练提供了平台。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推广“小微学习型组织”,以“挑战杯”、“创青春”竞赛为导向,以科技文化节为统揽,以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等活动为载体,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学校还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成立各种科技类社团,将全校创业创新活动常态化。支持校友创业,扩大创业教育成果。多年来,宿迁学院充分发挥学校专业优势、人才资源优势以及学校的社会影响力,采取多种办法,积极支持担任企业经理和自主创业的校友,不仅密切了校友企业和学校的关系,而且增强了校友对母校的感情,尤其是校友创业的生动事迹不断反馈到学校,对在校生的未来创业和职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影响,对扩大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就业指导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把其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首先,在就业指导课中增设大学生创新创业教学内容,并且将就业指导及创新创业课程作为学生的必选课程纳入教学大纲。同时,引进25门

人文社科类、10门创新创业类课程供学生选修。其次,充分利用“两课”教学的强大思想教育功能,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第三,成立了就业指导与创业指导课教研室,负责全院就业指导和创新创业教学的组织实施及研究工作。第四,三年级下学期联合市人社局举办大学生假期到机关企事业单位见习活动,让学生到企事业单位参加实践锻炼,把顶岗实训和就业安排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接受创业熏陶,培养吃苦耐劳的创业品质,培养适应各种工作环境以及承担责任和压力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第五,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引入“SYB创业培训项目”,开设《SYB创业教育》课程,让学生获得创办企业的知识,了解企业运作的流程、模式。

在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突出创新创业教育。利用新生入学,对其进行为期一周的职业生涯启蒙教育,让学生从入学开始就了解将来从事的职业、工作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帮助他们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进行职业能力测试,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设计,从而主动适应职业要求。安排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聘请企业精英进校园,举办创业讲座,通过就业创业教育和素质拓展,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精神和创业知识结构,唤醒学生的创业意识,点燃学生的创业激情,引导学生树立自主创业的观念。

在专业教育中注重培养创新创业能力。围绕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这个中心,逐步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根据“职业性”的原则设置部分课程,根据“应用性”的原则调整教学内容。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一方面注重学科课程的交叉渗透,强化专业基础,突出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另一方面突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构建较为系统、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实践课时的比例,为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宿迁学院实践教学的部分课程内容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实践性较强的毕业设计要到对应企业,与企业的生

产实践相结合,接受企业一线技术人员的指导和鉴定。

(三)创新培养模式,实现培养需求零距离

探索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进入实地考察,深入企业征求意见,积极探索经济管理类专业分类培养模式,将前两年按大类培养,第三学年起按方向培养的“2+2”培养模式调整完善为“1+3”培养模式。借鉴“卓越工程师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在信息类专业开展“3+1”和“嵌入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使企业全过程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参与企业项目开发,在真实的环境中培养学生专业实践技能。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学校先后与京东商城、中关村软件园、中兴公司等知名企业合作,建成“宿迁学院京东电子商务实验实训中心”,共建京东商学院,在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开展“嵌入式”培养。建立稳定实习基地的专业,让学生尽早与企业对接,实现培养和需求的零距离。

(四)适应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采取多种办法,有计划地选派专业课教师到企业相应的专业岗位进行学习和锻炼,时长6个月,要求教师能熟练掌握与自己所教专业相关的生产技术和目前最新的生产技术,提高自身的创新创业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努力打造一批“双师型”教师队伍,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 [1] 张杰.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四个关键”[N].中国教育报,2015-06-02(9).
- [2] 肖建忠.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基本属性和对策[J].企业导报,2010(11).
- [3] 卢洪刚,余颖.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现实意义及实施途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2).
- [4] 李涛,徐根方.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1).
- [5] 丁昭巧,王金良.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探讨-以广东科技学院为例[J].人力资源管理,2015(1).

责任编辑:徐晓婷

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与组训能力培养模式初探

——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钱胤嘉 王梅梅 陈超

摘要:加快培养高素质士官人才是推进新时代军队改革,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深入剖析当前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与组训能力的现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四自”管理模式与准军事化层级管理架构相结合的新思路。通过构建管理能力培养体系和组训能力培养体系,完善管训运行机制,可以全面提高定向培养士官管训能力,为我国士官队伍建设提供后备人才保障。

关键词:定向培养士官;管理能力;组训能力;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4-00077-04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战略思想,推进新时代军队改革工作的发展,加快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士官人才,国家教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联合发文,确定自2012年起,依托全国7省(区、市)的11所普通高等院校为部队定向培养应用技术复杂、培训周期较长的军地通用士官,即定向培养士官。定向培养士官作为部队作战训练和教育管理的基层骨干、专业技术保障的一线人才、密切官兵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完成各项工作的中坚力量,管理与组训能力的培养不可或缺。截至2018年,虽然定向培

养士官每年招生计划已突破2万人,但对其管训能力培养缺少足够的重视和提升路径,导致他们入伍后面临能力不足的瓶颈。因此,如何有效提升管训能力成为定向培养士官教育工作中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与组训能力培养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方面,加强管理与组训能力培养是实现定向培养士官与军队管训工作“无缝对接”的关键。定向培养士官的能力培养应当与士官队伍建设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士官教育学》对士官应具备

收稿日期:2019-06-06

作者简介:钱胤嘉,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士官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研究员;王梅梅,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士官学院讲师,辅导员;陈超,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士官学院辅导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三位一体”为核心的直招士官定向生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2016SJB880052)成果。

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士官教育要从培养单一技能型人才转变为培养专业技能、组训能力、管理能力等一专多能型人才。”在新时代军队改革大背景下，士官不再是单一的技能型士兵人才，而必须同时具备管理与组训能力。而管训能力培养正是定向培养士官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重视和加强。作为为部队定向培养士官的地方院校，必须紧紧围绕部队岗位需求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有的放矢地开展定向培养士官工作，才能使士官生走上部队工作岗位后顺利适应岗位要求，完成与部队的“无缝对接”。因此，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士官学院从建院之初，就把军政素养、管训能力、专业技能定位为定向培养士官的三大核心能力，形成“三位一体”培养体系。

另一方面，加强管理与组训能力培养是定向培养士官培养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对于一个系统化的定向培养士官培养体系而言，管理和组训能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从对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463位定向培养士官进行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90%的调查对象对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与组训能力有初步的了解；在回答“针对管理能力的培养有哪些制度”时，8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士官生管理办法》和《士官生一日生活制度》，有20%选择《各级骨干管理职责》，但是他们对相关内容的了解程度不够；另外，90%的调查对象对于组训能力培养方面的制度不清楚。这反映出该院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与组训制度不完善，体制不够健全，在提升定向培养士官管训能力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制度作为支撑。

二、加强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与组训能力培养的新思路

定向培养士官来源于一心向往大学生活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他们崇尚自由，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要求民主，这就决定了他们与应征入伍的社会青年有着很大区别。因此，定向培养士官的培养模式不能等同于军事院校学员的培养，在管理和组训能力培养上，不能把部队或军事院校的相关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过来，必须充分发挥地方

院校的优势，把地方院校的管理模式和当代大学生的自身特点相结合，以定向培养士官的自主管理、自主教育、自主服务、自主监督为载体，将“四自”管理模式融入准军事化层级管理架构，推进“管教融合”，完善定向培养士官管训运行机制。

（一）在骨干选拔培养体系中，采用“基础骨干轮流担任、中层骨干竞聘担任、高级骨干选拔担任”模式，完善骨干选拔、任命机制。制定并实施士官生管理能力培训计划，分阶段实施预提骨干培训与骨干晋升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骨干管理理论课程的学习和实践运用融合推进，定期考核，以骨干管理成效来逐步强化定向培养士官的管理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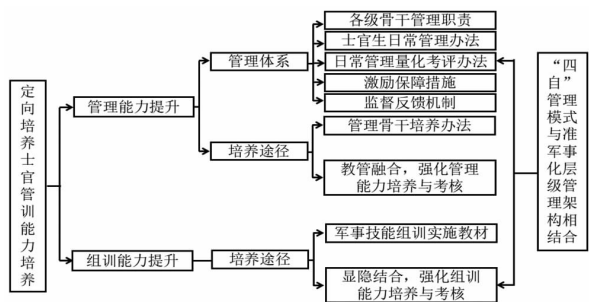
（二）在管理体系中，按照大队、中队、连队、分队、班的编制实行垂直化层级管理，明确骨干管理职责，以“一日生活制度”为管理基础，“纠风监察制度”为监控保障，“日常量化管理办法”为评价手段，制订日常管理量化考评激励保障措施以及监督反馈机制，作为管理工作进行制度支撑。

（三）在组训体系中，按照军队《军事训练大纲》，军地共同制订士官生军事素质培养标准，制订军事技能组训实施教材及组训考核方案，完善组训施教类课程建设，强化“教案编写、计划制定、组训施教、总结讲评”能力培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培训相结合，日常自主施训与假期强化集训相结合，制定组训能力提升计划；制定士官生组训技能军地联考实施办法，推进每周讲评、月度评比、学期联考工作；制定军训承训管理规定，建立“政治思想、纪律作风、理论知识、军事技能、组训能力、心理素质”等六方面的跟踪考核评价机制等，来强化组训能力培养与考核，从而全面提升定向培养士官的组训能力，进一步发挥定向培养士官主体性作用，促进管理效能，实现管训能力自我提升。

三、以“四自”为核心的准军事化层级管理模式

管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可以让一个团队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带领团队走向巅峰。在部队中，士官作为基层最直接的管理

者,对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及训练都要进行管理,定向培养士官入伍后成为士官,自然要承担管训职责,这就对定向培养士官的管理与组训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将学院的特色优势、定向培养士官个人成长与部队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以提升管训能力为导向,探索出一条以“四自”为核心的准军事化层级管理模式。



(一)管理能力提升路径

1.建立定向培养士官管理体系。培养士官在地方院校中有别于普通大学生,要提高管理能力,自然要针对定向培养士官的特殊身份来制定一套具有特色的管理体系。

(1)实行层级化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层级化管理实行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各职位之间职责明确,各司其职,能提高管理的效率。参照部队管理模式,将定向培养士官以大队为单位划分,设立大队长、中队长、连士官长、分队长及指导员、团支书等职位。宿舍则以班为单位进行划分,设立正、副班长,以达到方便管理的目的,并配套实施《各级骨干管理职责》,对各管理骨干职责进行明确的分工。

(2)制定《士官生日常管理办法》,定期进行考核检测。《士官生日常管理办法》的制定,意味着定向培养士官的日常行为必须规范并严格要求。它明确规定了定向培养士官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它也是士官生日常量化考评的重要依据之一。

(3)建立激励保障措施和监督反馈机制。定向培养士官日常表现将是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之

一。为督促定向培养士官严格遵守《士官生日常管理办法》,调动定向培养士官积极性,建立士官生荣誉体系,编制士官生荣誉手册,将日常量化考评结果与评奖评优挂钩,对表现优异的定向培养士官定期进行表彰并登入龙虎榜,对表现较差的定向培养士官进行鼓励。组建纠察队,纠察队由士官学院自我管理委员会管理。定向培养士官的量化考评由纠察队进行考评打分,由士官学院自我管理委员会进行量化考评成绩的汇总和公示,并负责量化成绩的答疑解惑工作,以确保日常量化考评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

2.管理能力培养途径。定向培养士官管理能力培养采用“教管融合”模式。

(1)借助管理体系帮助管理骨干迅速成长。在层级化管理中,由于职责的细化和分工,将会出现较多的管理岗位,这些管理岗位由定向培养士官担任,并通过骨干轮换和骨干晋升的方式,利用基层岗位任职来积累骨干管理经验、参与中层骨干竞聘来锻炼定向培养士官的胆识和担当,进而确保选拔出来的高级骨干能够独当一面。而骨干轮换可以确保岗位人员的流动性,让更多的定向培养士官参与到管理中。管理能力强的士官生经过申请和培训,可以担任各级骨干,表现优秀者可以提拔晋升;高年级士官生可以担任低年级管理骨干,从而带动低年级骨干成长,呈现“以老带新”的态势,让更多定向培养士官的管理能力得以提升。

(2)加强对在职骨干的管理能力培养。在职骨干的能力大小影响着对整个定向培养士官群体的管理效能。由于在职骨干人数相对较少,不便于大范围授课式的教育,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对在职骨干进行精细化培养。制定并实施骨干管理能力培训计划,分阶段实施预提骨干培训与骨干晋升培训,在全方位立体化的培养体系中,骨干能够切实开展工作,克服学生骨干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工作障碍,迅速积累自身管理经验,促进管理能力的提高。

(3)严格落实管理骨干的考核工作。对骨干的考核,旨在检验骨干的管理能力。为促进各级骨干

管理能力有效提升及晋升常态化,制定《士官生骨干考核评价办法》,推行课程评价、骨干管理能力测评(含管理成效)及群众满意度测评相结合的多重评价,建立骨干管理能力成长档案。主管骨干培养工作的辅导员老师将依据《士官生骨干考核评价办法》对管理骨干从政治思想、军事素质、文化学习、管理能力、现实表现、取得的成绩和民意测评等多方面进行考核。这是对骨干能力的一次大检验,能让骨干不断发现自身的优势及不足,以“查缺补漏”的形式实现管理能力的再提高。

(二)组训能力提升路径

组训能力与管理能力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优秀的管理能力有助于组训工作的顺利实施,组训过程又能促进管理能力的提升。组训能力的培养通过运用“显隐结合”的模式来进行,即把课程培训(显)与日常训练及见习组训(隐)结合在一起,以显带隐,以隐促显。

1.集体组织学习组训的方式方法,及相关条令条例,做到烂熟于心。作为一名合格的组训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要熟悉组训流程和相关条令条例,这样才能对知识进行正确的教授。为了提高定向培养士官的组训理论知识的学习,士官学院根据部队组训的相关条令条例,结合院校实际情况制定士官生组训能力培养标准,编制了《军事技能组训实施教材》、《组训能力训练实训》等,强化士官生骨干“教案编写、计划制定、组训施教、总结讲评”等方面的能力培养。

2.聘请部队优秀教官组织集训。部队教官拥有科学的组训方法及经验,聘请部队教官组织集训,一方面可以让定向培养士官在集训中最直接的了解到部队组训的流程及方法;另一方面可以近距

离感受部队的组训环境,引导定向培养士官形成一种身份认同。

3.参与组训,学会做一名教官。站在教官的位置,亲自组织训练,感受组训心情,在实践中提升组训能力是最有效的举措。学院主动对接省军区、省教育厅开展“学生军训承训资格证书”认定工作,每年组织定向培养士官参与新生军训。从第一年的见习教官开始,坚持实时汇报,天天总结,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教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全员顶岗”。这一过程极大地锻炼了定向培养士官的组训能力,增强了组训经验,做到了敢教、会教、能教。

4.建立考核机制,组织会操(汇报)表演。在每次阶段性训练结束时,开展会操(汇报)表演。在会操(汇报)表演中既能检验前期训练成果,同时也能直观的反映每位组训人员的组训能力。会操(汇报)结束后,对表现优异的组训人员进行表扬,表现不足的进行鼓励和纠正,以会操(汇报)的形式对组训人员进行考核是对原有固化考核方式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参与组训工作的定向培养士官实操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程勇.士官教育学[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 [2] 朱平.军民融合背景下高职专业技术士官人才培养模式构建[J].职业时空,2015(9).
- [3] 郁鼎文,等.加强军政素质训练,培养全面发展的国防生[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8(4).
- [4] 柳其红.定向培养海军直招士官生的探索与实践[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

责任编辑:郭晓东